

三遷溪園，半生戎馬： 論龍膺的園林書寫

何 易 璇*

提 要

龍膺（1560-1622），湖廣常德府武陵縣人。萬曆八年（1580）考中進士之後，終其一生在仕路輾轉，不斷遷徙，並來往於武陵故宅以及西寧、甘州等邊地之間。他對泉石的愛好，促使他不論在仕、在隱，皆將餘力投入兩地的園亭建設，並留下豐富的園林書寫，即《溪園六記》與《蒙史》四卷。在家鄉武陵以及鄰近之桃源，有勝果園、灑園、綸嶼三座私人園林，體現了他對自我生命歷程的省思。而在西寧湟中，則有蒙惠泉、清寧堂與醒翁亭等等公共建設，是他對政治教化的具體實踐。

本文擬從《溪園六記》中，梳理他從勝果園搬遷至灑園、綸嶼的過程以及理由；再者，從人倫之樂與浪游經歷的記憶留存，探討勝果園之於龍膺的意義；再次，則以釋、道信仰以及身分認同的切換，觀看灑、綸二園豐富的意涵。另一方面，以湟中的公共園亭為討論對象，從《蒙史》的編纂與蒙惠泉的開鑿談

本文於 111.08.21 收稿，112.03.15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DOI:10.6281/NTUCL.202303_(80).0001

起，梳理他如何實踐自己的政教理想；另一方面則從他對水石的愛好，論及他如何透過書寫來安放自己在羈旅中的困頓。

關鍵詞：龍膺、園林書寫、《溪園六記》、《蒙史》

Moves and Military: An Interpretation of Long Ying's Gardening Writing

Ho, Yi-Hsu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depth meanings of Long Ying's (1560-1622) garden writing through two works: "Xi yuan liu ji" and "Meng shih." As a literati of the Ming dynasty, his political career was not all plain sailing. Long got some leisure time to immer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arden. In his hometown of Wuling and neighboring Taoyuan county, he built three private gardens, namely Sheng guo yuan, Yin yuan, and Lun yu. In addition, he spared no effort to build a public garden in Sining where he worked in just a few months. The garden was not only a space for living and sleeping, but also a place to settle his exhausted soul. Each garden reflects Long Ying's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Sheng guo yuan preserved the memories of his life with his family. Yin yuan and Lun yu represented his Buddhist and Taoist beliefs respectively. As for the public garden in Sining, it showed his solicitude for politics and the people. This article hopes to provide multiple perspectives for garden literature in the Ming through the study of Long Ying's case.

Keywords: Long Ying, garden writing, "Xi yuan liu ji," "Meng shih"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三遷溪園，半生戎馬： 論龍膺的園林書寫*

何 易 璇

一、前 言

明清時期，園林發展蔚為大觀。箇中緣由，除了商業社會、城市生活帶來物質條件的滿足以外；園林更提供了讀書人於仕隱之際，追求心靈富足以及精神自由的可能。如何在人倫世界的羈絆以及個己自由的獨立之間取得生命的平衡，是朝廷貴戚以至鄉里小兒都不可避免的人生課題。相對於仕宦浮沉的不可自主，家園中書齋的擺設經營、栽植的布列規劃以及品物的命名寄託，則皆操之在我。從選定基址到園亭竣工，由竣工之後至理想生活的實踐，過程中種種財力、物力、心力以及情感的投入，都化為此地的空間意義，反映著園林主人對世間宇宙的觀照以及對自我心志的省思。可以說，園林是士人用以安頓身心的場所，是他們得以出入仕隱的一處桃源。¹

* 本文承諸位審查先生的悉心審閱，惠賜寶貴建議。並於寫作期間得業師曹淑娟先生指導，同門學友勝輝亦不吝指教。從字詞訂正、材料援引至文本詮釋的商榷與意見，皆使筆者得以重新省思龍膺的園林書寫，並在修改的過程中經驗閱讀的喜悅，於此謹申謝忱。

¹ 曹淑娟先生於論述明人園記時，嘗引述蘇軾的〈靈璧張氏園亭記〉來說明園林與仕隱之間的關係。其曰：「園林作為士人出入市朝與山林間的一道旋轉門，不必仕，亦不必不仕，因為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走出門去，縱使歷仕三朝，受知人主，亦不妨於胸中縈念山林丘壑，而轉入門來，回歸野老身分，亦不必絕口朝政。仕隱出處是形跡，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流轉於形跡之外的超然心境。認識這樣的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出生於湖廣常德府武陵縣的龍膺（1560-1622），²即是園林興造的愛好者。他在家鄉武陵以及鄰近之桃源，興建了三座私人園林：勝果園、灑園以及綸嶼；同時也在出使湟中的期間闢建了一座以蒙惠泉為中心的公共園亭。³對他來說，每一次的構築、擴建、新造與搬遷，

園林歷史背景，再來讀明人園記，也就能了解主人往往遊走於仕隱之間，及其有園得以歸守的珍惜心態。」參見曹淑娟：《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年），頁58。

- ² 龍膺，初字君善，後改字君御。別號茅龍氏、朱陵、灑人、醒翁、綸叟、偃骨無學人；自稱綸灑先生，晚年又號漁仙長。湖廣武陵人，以楚人自矜。一生著述豐富，除了詩文創作以外，尚有他對佛經、丹經的詮解，以及地方志書的編纂，傳奇劇本、套詞的創作。如《綸灑文集》、《綸灑詩集》、《九芝集》、《湟中詩》、《晉寧草》、《漁仙雜著》、《陸度航雜著》、《西寧衛志》、《蒙史》、《丹經撮要》、《心經注略》、《金門記》、《藍橋記》等等不一，只可惜不少作品俱毀於兵燹之際。幸賴多位子孫傳承、整理，由龍膺八世孫龍正楷編定為《龍太常全集》四十六卷，九世孫於光緒十三年（1887）重鈐。現今則由梁頌成與劉夢初點校後出版為《龍膺集》。
- ³ 儘管龍膺並未將他在湟中闢築的系列建物稱之為「園」，但筆者認為他在書寫中強調「與民共樂」的宗旨以及對修造行動的描寫、仕宦能力的肯定，系承繼了唐宋以來公園文化中「官署園林」的發展脈絡。侯迺慧《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中認定的地方政府公園，乃是在郡齋、郡圍等府署辦公地，或者官吏宿舍之內，附屬的廣大園林。在此基礎上，曹淑娟〈唐代官亭的建置及其書寫〉則提出更進一步的觀察，認為在唐代有一批「別於大型湖山公園、也未必附屬於郡齋及官舍的公共性園亭建設。……立亭者選址自由，不必與郡齋官舍相連屬，規劃形態多元，或為單一建築，或者形成建築群。官亭建成，往往開放向同僚、賓朋乃至當地居民，成為公共性景區。」綜合兩位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清寧堂」即是龍膺於湟中的辦公處，而四座候亭，即如曹氏所述，屬於選址自由，自成一派風景的輕量建築。此外，就龍膺書寫建物記的方式來說，他似乎也有意將這一群建物視為一個整體。例如在〈北泉清寧堂記〉裡，可以看出龍膺是以「北泉」為起點，如園主般導引著讀者一步步走過醒翁亭、淡空庵再至清寧堂處。此後隨著地方所需又陸續興建了枕漱軒、丈人亭、醉歌亭、達勝亭，其位址亦多能彼此串連。因此，筆者依然認為湟中的系列建築當可視作公共園亭來進行討論。西寧屬於邊地，又屬兵備要地，建設頗為困難，自然難以像一般行政區域可以規劃大型公園，甚至於追求園藝經營。不過，在體量輕巧的建設中，龍膺不只是重視其實用功能，同時亦盡可能地尋覓佳址，以自然風景妝點，筆者認為已屬不易。關於公共園林的研究，筆者主要參考侯迺慧：《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以及曹淑娟：〈唐代官亭的建置及其書寫〉，《臺大中文學報》第67期（2019年12月），頁45-86。

都標誌著他在人生旅途以及仕宦經歷中不同階段的體驗與感悟。

萬曆八年（1580），龍膺考中進士，踏入仕途；而兄長龍襄則因為屢試不售，選擇陪侍膝前，形成了兄主內、弟主外的責任分工。然而，他耿直狂狷的性情，註定難以為官場所容。為了貫徹他心中對家國、百姓的關懷，甚至不惜抗顏直諫，為此屢遭貶謫；此外，再加上家人的相繼逝世，使得他不得不拋下任職，返鄉服喪。種種波折使得他終其一生都在仕路輾轉，不斷遷徙。而在宦遊中所見到的名山勝景，皆因此成為他構築園林的理想範本。簿書繁忙之中，山水是他心靈的慰藉，園林是他精神的依止。他對泉石的喜愛，促使他不論在仕、在隱皆投入園亭建設，並且留下了豐富的園林書寫。

描繪家鄉園林的《溪園六記》，是他在仕宦中對於有園得以歸守的繫念；記述宦中園亭的《蒙史》，見證了他對政治教化的關懷與實踐。筆者認為龍膺的園林書寫，具體展現了明代園林的不同樣貌：對他來說，園林的興建與存有，不僅僅只是仕途退轉的個人閒居空間，同時也可以是仕途當下的政治教化空間。

學界目前的研究成果，以劉斌《龍膺研究》⁴為當前較具整體性的討論。此外，單一主題的研究大抵聚焦於他的詩社活動與詩歌創作，⁵少數涉及他與

⁴ 劉斌：《龍膺研究》（湖南：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呂斌先生指導）。

⁵ 伍光輝：〈龍膺參與晚明結社活動考論〉，《中國文學研究》2013年第1期，頁47-51。伍光輝：〈龍膺參與洪中結社活動考辨〉，《衡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4卷第2期（2013年4月），頁81-84。溫猛補：〈明代溫州白鹿社考〉，《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4卷第3期（2014年9月），頁18-23。王乒乓：《明代永嘉文人音樂史料考析——「白鹿詩社現象」的發現、考證與探究》（上海：上海音樂學院音樂與舞蹈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戴微先生指導）。汪琴：《明代新安汪氏「二仲」的文學結社活動及文學創作》（安徽：安徽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耿傳友先生指導）。陳繼煦、李躍忠：〈龍膺詩學的性靈思想探析〉，《文教資料》第36期（2020年12月），頁29-31。陳繼煦：《龍膺詩歌研究》（湖南：湖南科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李躍忠先生指導）。

湖湘地方文化之間的關係，⁶ 以及他所參與的戰事：湟中三捷。⁷ 園亭建設的方面，共有四篇文章值得留意：楊在鈞〈隱園居士龍膺〉，⁸ 從佛教的角度切入討論龍膺的信仰以及瀝園的建設。梁頌成，作為《龍膺集》的點校者撰寫了兩篇文章，分別是〈書成三黜題孤憤，詩就千篇逼大家——龍膺的生平與創作述論〉⁹ 與〈龍膺園藝思想對創建現代最佳人居環境的啟示〉，¹⁰ 筆者於此獲益良多。作者指出龍膺在文學創作方面有兩大引人矚目的焦點：一在於以《溪園六記》為核心的「山水旅遊文學創作」，展現了萬曆時期山水文學的高度。二在於以《蒙史》為中心的「西部文學創作」，¹¹ 為後世讀者提供了追尋青海、甘肅一帶特異風光的線索。朱曉峰〈明末戍將茶痴龍膺——青海西寧茶文化建設的奠基人〉，¹² 亦指出龍膺在西寧的相關建設與《蒙史》的書寫，彌補了青海地方史志文獻上的不足。

在此基礎上，筆者希望能夠以點校本《龍膺集》¹³ 為主要材料，更深入地

-
- ⁶ 梁頌成：〈龍膺與湖湘屈原文化〉，《求索》2012年第6期，頁151、158-159。李世進：〈論龍膺與常德地方文化文學傳播〉，《文學研究》第16期（2021年4月），頁39-41。
- ⁷ 趙宗福：〈明代「湟中三捷」考評〉，《青海社會科學》1987年第5期，頁90-95。張興年：〈從「甘山初捷」到「松山大捷」——明萬曆二十三年「湟中三捷」管見〉，《青海民族研究》第23卷第3期（2012年7月），頁131-135。
- ⁸ 楊在鈞：〈隱園居士龍膺〉，《禪刊》2003年第3期，頁76-79。
- ⁹ 梁頌成：〈書成三黜題孤憤，詩就千篇逼大家——龍膺的生平與創作述論〉，《湘南學院學報》第29卷第4期（2008年8月），頁26-35。
- ¹⁰ 梁頌成：〈龍膺園藝思想對創建現代最佳人居環境的啟示〉，《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2期（2008年3月），頁84-86。
- ¹¹ 梁頌成：〈書成三黜題孤憤，詩就千篇逼大家——龍膺的生平與創作述論〉，頁29-31。
- ¹² 朱曉峰：〈明末戍將茶痴龍膺——青海西寧茶文化建設的奠基人〉，《農業考古》2021年第2期，頁113-117。
- ¹³ 由於龍膺的詩文著作目前僅見《九芝集》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其他刻本多藏於海外之圖書館。因此，本論文暫以點校本作為論述的依據。使用的版本為梁頌成、劉夢初點校：《龍膺集》（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舉凡《綸瀝文集》、

梳理四座園林之於龍膺的個別意涵，並期待能夠藉此填補湖南園林以及湟中建設在中國園林史上空缺的一隅。

討論內容分為兩個部分。第二小節，以龍膺的三座私家園林為討論對象。首先，透過《溪園六記》及其記序，梳理他從勝果園搬遷至灑園、綸嶼的過程以及理由；再者，從人倫之樂與浪游經歷的記憶留存，探討勝果園之於龍膺的家園意義；再次，以釋、道信仰以及身分認同的切換，呈顯灑、綸二園的殊勝所在。第三小節，以湟中的公共園亭為討論對象，一方面從《蒙史》的編纂與蒙惠泉的開鑿談起，梳理他如何實踐自己的政教理想；另一方面則從他對水石的愛好，談及他如何透過書寫來排解自己在羈旅中的困頓。最後，則以醉醒之別與迷悟之辯作為二者的收束。

二、三遷溪園：從勝果園、灑園到綸嶼

龍膺在家鄉常德府的三座園林，分別是位在武陵縣的勝果園、灑園以及位在桃源縣的綸嶼。他將自己所撰寫的六篇園記：〈勝果園記〉、〈灑園記〉、〈千秋閣記〉、〈石梁閣記〉、〈綸嶼記〉以及〈桃柳航記〉合稱為《溪園六記》，並寫下了一篇簡短的序文。作為六篇園記的收束，龍膺在記序中說明了自己由勝果園搬遷至綸嶼的過程，並有意透過移動的次第來串連諸園的意義。對他來說，每一次的遷徙都表明了他對安穩棲居的追尋，同時也更加堅定自我不欲為榮瘁升沉所動搖的高潔心志。然而，在龍膺以「遷徙」作為主軸連結諸園意旨的同時，他也因此分判了三座園林在居住條件上的優劣之別，而未能呈顯出他在構築當下的心境與感受。

《綸灑詩集》、《湟中詩》、《晉寧小草》諸作，皆引自《龍膺集》，未免繁瑣，後引不再另外標註。另，此本著作更早嘗於 2008 年 9 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發行，當時的版本中除了龍膺本人的著述之外，尚收錄了《先集遺搜》二卷以及《龍氏外集》二卷，內容為龍氏家族的作品以及他人的相關詠懷，不知何故未見於後來的版本中。

就園林建成的順序而言，是勝果園在前，瀝園以及綸嶼在後；就書寫時間而言，則是〈瀝園記〉與〈綸嶼記〉在前，〈勝果園記〉在後。並且，〈勝果園記〉以及記序都是在龍膺晚年遠赴河東，任職山西參政時所撰寫而成的作品，是他遠離鄉園之後的回顧與回望。這之間的時空落差造成園林主人在書寫與構築之間，對園林的意涵產生了不同的思考。這是閱讀《溪園六記》以及記序的特別之處，讀者可以在龍膺與園林的對待關係中，體驗到時間的遞進與人事的變化所產生的作用。

（一）溪園的建設與遷徙的過程

在討論之前，為了能夠對三座園林有更清楚的認識，筆者擬先順時梳理它們的構建位址、興造的時間以及理由。接著，再更進一步探討龍膺撰寫〈《溪園六記》自序〉的意義，並拈出該篇序文與園林記文在內容上呈現何種差異。

首先，勝果園，作為龍膺最早著手建設的一座園林，座落在武陵縣城城西。據府志云：「九芝堂，在大西門內」¹⁴ 以及園記：「復請間出西郭飭舊館」¹⁵ 云云者，可以推測勝果園的範圍涵蓋城內宅邸以及城外池館。它的建設過程根據〈勝果園記〉可知，該園構築於萬曆十四年（1586），拓建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最終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落成。三個建設時間點，分別對應的是龍膺在仕宦途中所遭遇的罷官、升遷以及父喪。而記文寫成的時間，則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至泰昌元年（1620）之間。當時，龍膺正擔任山西參政，為書簿所困，心眷鄉園而寫下此篇可謂總結他一生經歷的園林記文。

其次，瀝園，位於武陵縣東北約莫十里處，與柳葉湖相鄰。該園的園記完稿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建設工程則持續至萬曆三十七年（1609）。龍

¹⁴ 清·應先烈修，陳楷禮纂：《（嘉慶）常德府志》（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卷6，頁10b，總頁80。

¹⁵ 明·龍膺：〈勝果園記〉，《綸瀝文集》，卷7，頁184。

膺在勝果園建成之後，即往赴北京任職北戶部郎中（1605），而後又隨即改授為陝西按察司僉事，治兵甘州（1606）。不幸，母親唐氏隔年卒於甘州任所（1607）。因此，龍膺不得不在萬曆三十六年春正月，扶柩南歸，返還武陵。而灑園的建設，正是他為了追薦父母而打造的，一處帶有宗教意涵的園林居所。

最後，綸嶼，在桃源縣縣西漁仙洞一帶，距灑園約百五十里。該園始建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竣工以及園記撰寫的時間不明。然龍膺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即北上赴闕，授山西參政，故筆者認為該園完工的時間不會超過萬曆四十四年。萬曆三十八年（1610），龍膺除服，赴京待選，授任甘山兵備分巡道副使。爾後兩年即往返於甘州與西寧之間，為政務奔走；他在湟中停留的數月之內，投入地方建設，興建湟中園亭。不料，束身自好的他卻無端遭受彈劾，鬱憤難平之下，龍膺即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解官故里，在武陵度過三年的賦閒生活。綸嶼的興建，正在此時。

由上述可知，勝果園、灑園、綸嶼等三座園林的興建，與龍膺一生在仕宦的浮沉緊密相連，也和他在家中所遭遇的悲慟有關。至於他在湟中開闢蒙泉，為百姓、也為自己所打造的一方清淨樂土，則可視為地方教化的實踐。可以說，龍膺為國、為民、為家的理想與挫折，俱繫於園林的興建之中。對他而言，園林所乘載的意義，不只是社會地位的象徵，也不只是造園技藝的展現；而是自我生命的安放，是他用以確立自我價值，展現自身獨特性的棲居之地。

然而，龍膺真正安居於園林中的時間，實則屈指可數。與其將心力、財力投注在新園的構築，何不專心致志於舊園的修造與護持？對他來說，溪園三遷究竟所為何事？在《溪園六記》的自序中，他將搬遷的理由歸因於對外環境的不滿，所謂「余性嗜潔厭囂，晚節尤摯。」¹⁶ 他對人事剝啄的厭棄以及對清寧潔整的追求，使他一步步遠離市城，走向山水。

起初，由城內九芝堂至城外霞照樓的遷徙，尚侷限在勝果園的範圍之內。

¹⁶ 明·龍膺：〈《溪園六記》自序〉，同前註，卷2，頁60。

九芝堂由於鄰近市井，朝則室廬喧囂，夕則市媪傾倒廁踰，令人作嘔。於是他便由九芝堂搬遷至城外霞照樓，曰：「風生芳杜。香氣逼人，可以忘寢。」¹⁷ 只可惜勝果園的落址，恰在滇粵之間的交通要道，車馬之音難絕，剝啄之聲此起彼落。因此，他便決意遷往灑園，曰：「據菌閣，擁韋編。暇則豎拂林間，鳴榔水際，大足自愉。」¹⁸ 然而，灑園所在尚於城郭不遠，賓從難卻。於是他又遠赴桃源，遁入綸嶼。在江濤竹韻之間，得坐忘之境，而曰：「此時危坐，塵滓都消，寧復知有升沉榮瘁之態。」¹⁹

他以居園者的感受，依三座園林與市城的距離將其做出高下的分判，認為勝果園不如灑園，灑園又不如綸嶼。並在記序的後半段中，以問答的形式點出了書寫的意旨。客曰：「茹甘啖脆，養生者需之，君何遠市城若此？」²⁰ 他引唐代陸龜蒙〈杞菊賦〉以及《莊子》、《抱朴子》中的典故作為回應，強調自我不欲為慾望驅使，與眾同流的志向。其曰：

汝不聞天隨生乎？人言「千乘之邑，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君何關之閉也？」天隨生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客乃軒渠而去。嘻，吁！鴟梟之鷲擊，孰與鷓鴣之枝棲而安；蜩螂之穢饜，孰與玄蟬之露吸而潔？既潔且安，吾志得矣，復何慕猥慚小草！²¹

其實，龍膺在園林建成之後，自然可以因為不同的用途，隨心所欲的遊走在三座園林之間。然而，在序文中他卻刻意強調三座園林與城市的距離，以及它們各自不同的居住感受。背後的意圖，正在於透過「搬遷」的行動凸顯他對世俗紛擾避之唯恐不及的心境；同時也強調他最終得以在桃源綸嶼，放下對升沉榮瘁的執取。

17 同前註。

18 同前註。

19 同前註。

20 同前註。

21 同前註。

然而，若回到個別園記的書寫脈絡，卻又可以發現他其實相當肯定勝果園和灑園與市城相去不遠的交通優勢，例如他描寫勝果園：「桃柳悅人，禽魚適性。且距郭咫尺而近，來往不疲款賓，中宵猶可叩關而入。」²²又寫灑園中的千秋閣曰：「予生平抱山水癖，而又不樂形勝太顯著，……更懼去城郭遠，為攜琴問字者所苦難。惟此數畝之區，擁溪山之勝，去郭才十里。」²³可見，在園記的書寫中，龍膺並未對賓從剝啄表露不耐，縱使是寫於山西任職上的〈勝果園記〉亦是如此。因此，筆者認為園記與記序之間的書寫差異，一者呈現他在總覽三座園林與個別園林時的不同視角，二者則更強烈地反映出他在撰寫記序時的心境。若考慮到龍膺撰寫這篇記序的時間點，是他擔任山西參政的任職期間，便可以理解在他後設性的回顧中，這一份對遠離市城的強烈渴望，乃是他意欲潔身自好的避世心境。背後深藏著他眼見家國瘡痍滿眼，卻終究難以有所作為的深沉無力，所謂「國步若此，出何能為？」²⁴

記序完成的當時，他在山西參政的職任上，因政務來往而結識平陽府知府傅淑訓（1581-1658，字啟昧、咨伯）。由於二人為故楚同鄉，龍膺遂將六篇園記與之分享。他在書信中誠摯地提出邀請：

即今天時人事，大有可虞。吾憶吾園，真成樂國。時一披對拙記，聊以豁此畸愁。幸弁以數言而付之築氏，不惟徼鄉曲之譽，且以訂湖海之盟。異日為采真游，辱訪吾園，不為生客耳，如何？²⁵

可見，龍膺之所以在遠赴晉寧時著手整理園記，乃在於期待能夠以文字臥遊，解消現實處境中的憂慮。至於他的邀約，更透露了他是以寄託未來的方式，安頓自己當前的愁苦。

²² 明·龍膺：〈勝果園記〉，同前註，卷7，頁185。

²³ 明·龍膺：〈千秋閣記〉，同前註，卷7，頁189。

²⁴ 明·龍膺：〈偃骨無學人傳〉，同前註，卷8，頁212。文中此段話語雖然是龍膺更早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左右，任職甘山兵備分巡道副使時所言，但筆者認為這樣的心境愈至晚年，愈加濃烈，用來說明他寫園記序文的心境當無不可。

²⁵ 明·龍膺：〈與平陽守傅咨伯〉，同前註，卷26，頁475。

話雖如此，龍膺在心繫家園的同時，對於政務亦未嘗懈怠。他的書信，即充分展現了他的憂慮與愛民之心。他曾不無自矜的向咨伯表示：

不佞生平負性頗急，任事頗勇，而持法極平，存心極恕。遇人有過，每明張目膽責讓之，曾不匿怨，亦不避怨。絕不暗害一物，以自蹈於含沙射影之所為；亦絕不搜索人隱過癥垢，以效鈞距束濕之政。故上下相與者，久而信之愛之。自弱冠做理官時便如此。²⁶

可見他對政務絕不苟且的態度。他曾經親授蝗蟲捕滅之法，以倉廩賑濟災民；又練鄉兵、行保甲，將三十多名賊盜繩之以法。²⁷然而，正因為他對地方、對民情的深入理解，使得他發現「此中法紀盡頹，事事掣肘」，²⁸眼見國事大壞，卻又徒有剛腸，孤立寡援。他雖有意維繫家國安穩，卻難有著力之處，最終只能念戀他的桃源樂土，聊以安慰。

總上，讀者可以看到龍膺在六篇園記的序文之中，通過溪園三遷的行動來凸顯自己鶴鷗一枝，不與眾為伍的高潔志向。同時，通過書信輔助，也可以發現他在「吾愛吾廬」的宣稱背後，並未對家國之難、百姓之苦袖手旁觀。以下，筆者將進一步從個別的園記書寫中，梳理龍膺對勝果園、灑園以及綸嶼三座園林不同的寓託。

（二）園以果勝：人倫之樂與浪遊經歷

勝果園作為龍膺的宅第園林，從萬曆十四年（1586）到萬曆三十二年（1604）終告落成，它的建設最早，歷時最久，因此也見證了龍膺由少而壯的成長歷程。然而，在龍膺晚年的書寫中，他最常掛念的兩座園林，乃是灑園以及綸嶼。詩詠、書信以外，他甚至寫了一篇〈綸灑先生傳〉來闡釋自己如何在兩座園林之間，任意的切換自我的身分認同。相較之下，有關勝果園的記述似乎相對是少數。筆者認為書寫的缺席，除了龍膺晚年對勝果園在地理位置上鄰

²⁶ 明·龍膺：〈與傅平陽〉，同前註，卷 25，頁 454。

²⁷ 明·龍膺：〈與李祝垣侍郎〉，同前註，卷 25，頁 459。

²⁸ 同前註。

近市井的不滿，及其作為宅第園林的私密性以外，尚且來自於他在情感上的沉痛。

一般園記的書寫內容，往往著墨在命名的寓託、景點造設，或者園亭遊覽。然而作為他晚年身處異地的一次回顧，龍膺在〈勝果園記〉中以大量的篇幅，紀錄著他從萬曆四年（1576）起至父親逝世前後，每一次在宦途中的浪遊經歷，以及歸返鄉園之際與家人的相處。對他來說，勝果園像是一個巨大的記憶封存所。他在仕宦途中遭遇的挫折與欣喜，在家庭中感受到的至樂與至悲，皆如同一張張幻燈片，在園林建成之後仍一幕幕放映著。敘事中，父母、兄弟的身影與龍膺的浪游經歷，不斷交織，最終譜成他對園林之樂的省思：在人事之可貴，而不在名爵、品物之難得。可以說，〈勝果園記〉是《溪園六記》中最特別的一篇書寫。

他以「予負性癖山水甚摯」作為開頭，總攬全篇要旨。於是在自述生平的時候，他往往著墨於他在行旅中與文友、詩友遊覽登臨、品第泉石，清狂而不受拘束的一面，而不談遭受貶謫時的不滿與憤懣。他將園林以「園以果勝」之意，命作勝果園，用意正在於將仕宦波折之苦，轉化為園林興建之樂。其曰：

夫天以播遷之役資我浪游，無論薊北江南，多予履迹。即東極甌海，西極流沙，撰轡停驂，萬有千里。奇巖怪壁，幽澗湍湍，罔不羅而貯之胸臆。乃闢一區宮數畝，而樂將終其身焉。²⁹

浪遊的經歷，使得他能將草木山川納之胸臆，儲之園林；仕路中輟的歸返，使得他能承歡膝下，兄弟怡怡，一享天倫至樂。相對於困逆旅、治軍書的疲憊，以及在軍旅中暴露風霜、躬冒矢石的危殆，勝果園對龍膺而言，無疑是一處可供身心安頓的居所。而園林裡的增建與經營，也都標記著他在仕宦途中升遷與貶謫的經歷。

例如，萬曆十四年（1586），擔任徽州府推官的龍膺以「詩酒掛吏議」³⁰ 謫

²⁹ 同前註，頁 185。

³⁰ 明·龍膺：〈汪伯玉先生傳〉，同前註，卷 8，頁 205。

返武陵時，他便在城外西郭闢建新居，並取老子典故將堂室命作「猶龍館」，³¹寄託他對潛沉再起的自矜，以及讀書人偶一受挫的忿忿難平之氣。而後，在萬曆十九年（1591），他於京城任官，上疏諫選宮女，幾死；隔年，又上〈乞釋逮臣疏〉替魏學曾辯護。耿直剛毅的行事作風惹來同僚相妒，遂遭貶謫為浙江鹽運判官。赴任的途中，他與友人羅廩同返武陵，又葺新居，其曰：「時家大人亦謝計部歸老，定省暇，乃葺西郭池館以居高君，狂態尚作。」³²由此可見，仕路波折帶來的鬱憤，他在園林中找到抒發的出口。歸返與構築，似乎成為他的固定模式。

然而，當他以為只要將耳目所及之山川風土，化作園林中的一臺一沼，便可樂以終其身；到頭來，卻在家人相繼離世之後，終於明瞭「樂之繫於山川草木魚鳥者，皆非性情之至也。」〈勝果園記〉寫於山西參政職任期間，彼時家人的身影早已逝去多年，拉開時間、空間以及情感的距離，他通過對自我生命歷程與園居經驗的回顧，梳理出園林之樂與人倫之樂二者間的關係。其曰：

抑予於是有感焉。當庚子（1600）前，圃不加廣，館不加飭，蓬蒿委徑，荊棘繞垣，颯嘯淒風，蟬咽零露。然吾游之而樂且甚也，何也？以是時二人偕老，兄弟友于，愉愉怡怡，而不知有名爵富貴，珠玉金紫，及一切世間可欣可悅之事，未足以易此樂也，故其樂真。及癸丑（1613）歸，危樓曲榭，施堊流丹，嘉樹名花，含芬交蔭。視向之為園，不啻什伯，而予游之不加樂也，何也？風木興悲，池草斷夢，杜鵑啼血，鶻鷓摧肝，予悉樂也？乃知樂之繫於山川草木魚鳥者，皆非性情之至也。³³

他以萬曆二十八年（1600）作為分界，為勝果園中的生活作出了樂與悲的分判。那一年，是他升遷為南戶部員外郎後的歸省，同時也是龍膺父親，龍德孚

³¹ 漢·司馬遷著，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老子韓非列傳〉，《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63，頁2140。

³² 明·龍膺：〈勝果園記〉，《綸灑文集》，卷7，頁183。

³³ 同前註，頁185。

的七十大壽。記曰：

已，借公事還，是為庚子。於是治西第九芝堂，列花石堂下。花皆名品，滇茶、赤素二本尤珍異。石，故金陵魏國鳳凰臺第一峰，予以文購得之者。輔以青霄錦川，如劍如笏。翼以喬松二，奇秀而古。予日從孝廉奉尊壘為二人壽，計部公玩而樂之，紀以詩。復請間出西郭飭舊館，左右鄰爭以其居售予，地益拓。³⁴

這次的返鄉既不為奔喪、也不為貶官，可以說是龍膺人生中少數「衣錦還鄉」的輝煌時刻。他所佈置的奇花異石，深得父親的喜愛；同時，他也藉此機會拓建了勝果園林。如秀野軒、庵摩羅閣、青棠館、采蘅約、香雨亭、杜若草堂、霞照樓，等等亭臺的興築俱始於此次的修造。其中，龍膺對霞照樓的設置更是頗具用心，它與父親的玄扈石室³⁵相隔僅僅數十武的距離，所謂「層臺相望，不勝謁屺之思焉。」³⁶

在武陵家鄉停留了一年之後，龍膺以「而翁幸健飯，何不思所以報國世恩乎」為由，催促龍膺動身前往南京任職。不料，離家才兩個月而訃聞隨至。對此，他不禁悔泣呼號：「其以是別為永訣乎？不及一奉遺命於易簣之時，慟何如也！終天謂何，孤等烏能不拊膺擗踊，仰天而號，而泣繼以血也？」³⁷聽從父親的催促赴京任職是孝；然而，未能於易簣之時陪侍是不孝。在孝與不孝之間，他要如何面對自己的錯過？

返家服喪的三年，龍膺將心神投注在勝果園的經營；喪期服滿之時，亦正是勝果園的落成之日，對比先前充滿喜慶的賀壽，不免令人唏噓無奈。在〈與

³⁴ 同前註，頁 184。

³⁵ 見〈先大夫南戶部員外郎誥封郎中修正庶尹玄扈公府君暨先太宜人狀〉曰：「中歲好道，調息守中，晚節事佛，官明州，一衲一蒲，功行精進。以焚經故，授記普陀，屠儀部公隆為《靈異記》。歸，結精舍於德山，築玄扈石室於西廓，命其樓曰『對湘樓』，吟咏自適。」同前註，卷 11，頁 249。

³⁶ 明·龍膺：〈勝果園記〉，同前註，卷 7，頁 184。

³⁷ 明·龍膺：〈堂祭先考文〉，同前註，卷 11，頁 253。

劉嵩門刺史〉的書信中，即透露了龍膺強顏奉慰母氏的同時，以園林的經營作為節哀順變的途徑。其曰：

不肖抱先大夫之戚，哀毀奔廬，幾無人理，強顏飲泣，以奉慈闈。日待板輿，甘半菽如五釜。暇營數畝於西郭，頗遠市囂。疊石為山，臨流駕（架）屋，濤生灌木，月掛疏筠。東望善卷層臺，西睇秦人舊壑，邈然有遁世之想。臥雲枉過，留數月園中，不履不冠，時飲時弈，絕無賓主逢迎寒暄酬酢之禮。³⁸

在園林的興建工程中，龍膺透過身體力行的疊石、駕屋，以忙碌調節頓失親人的哀痛；同時，也在園林建成之後，藉由與世氛阻絕的生活情境，來避免自己的情緒起伏波盪。除此之外，龍膺不僅在勝果園中的霞照樓，參禮金粟；³⁹也經常在勝果園附近的對湘樓中與哥哥龍襄、他們的方外友人杜越凡居士，一同研習梵唄，陪伴母親。⁴⁰

對龍膺來說，人去而樓空的孤寂，是他心中最難以承受的重量。他的父親在萬曆三十年（1602）逝世；母親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仙逝；而兄長亦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撒手人寰。於是，當他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從滄中回返鄉園時，難免觸景傷情，不可遏止。一如他在〈哭吾兄文〉中所示：

西郭有先大夫石室，樓層臺上，曰「對湘」。兄檀園距其右，吾勝果園距其左，咫尺相望，竹樹蒼然。吾以屬吾兄及京弟曰：「此先人之所依也。吾出，而兄時時算之，如見先二人也。」今兄且從二人地下，而京弟稚，其何以永先人之澤乎？嗚呼慟哉！⁴¹

³⁸ 明·龍膺：〈與劉嵩門刺史〉，同前註，卷 24，頁 440。

³⁹ 見〈募修大慈庵疏〉：「余年來闢居霞照樓，參禮金粟。」同前註，卷 18，頁 343。

⁴⁰ 見〈杜越凡居士傳〉曰：「愚兄弟留館對湘樓之旁舍，治佛廬以習梵唄，為先大夫資冥福，且為先淑人祈年也。居士心亦樂之，以此方山水佳勝，而土風多勢相謗，法意主闡化，為作津梁。先淑人率諸婦悉延優婆夷講佛法，誦經持准提秘密，居然火宅中一淨土也。」同前註，卷 8，頁 210。

⁴¹ 明·龍膺：〈哭吾兄文〉，同前註，卷 11，頁 262。

父親的對湘樓、兄長的檀園以及自己的勝果園，三座園林咫尺相望，如同家人彼此照看。然而，在家人相繼離世之後，園林在缺乏人為護持的情況下也將隨時間慢慢走向衰頹。對龍膺來說，這不只是物質的頹敗，同時也是在頹敗中照見親人離世的孤寂以及家族承傳的難以為繼。

然而，縱使過往的身影不在，勝果園中的亭臺樓閣，花草樹木，其形制、安排畢竟記錄著家人與自己往日生活的足跡，是不可拋卻之物。是以龍膺在園記末尾曰：

雖然，予髮種種矣，回憶廿年前少年故態，如醉如狂，如夢如幻。向所手植庭樹，亦已蒼然十圍。百年幾何，堪此悒悒。予又安能不借此臺沼以自寬乎？老絆一官，睽違鄉國，雲山滿眼，吾念吾廬，因寫予思而為之記。⁴²

對他來說，與家人相處的人倫之樂，以及他在宦海浮沉中的浪遊經歷，如他任新安推官，與眾友結白榆社，第泉品石；任溫州府學，結白鹿社，日以登臨為期會；轉官國子監博士，覬龍德孚邸舍，偕龍襄於靜海寺度歲；而後奉聘南闈校士，又結橫山社；後則再入遼塞，隨軍征戰等等遭遇，⁴³無一不與勝果園廿年的興建歷史相互對應。而今遠在山西為逆旅所困的他，也只能透過書寫中的人事追憶，聊慰鄉思，遂以成篇。

（三）灑綸二園：可仙可佛的身分認同

前述已及，龍膺在擔任山西參政的期間（約莫在 1616-1620），以林園世界的安穩，來撫慰自身四方奔走的疲憊。他將溪園六記遞呈給鄉友傅咨伯時，嘗自述編纂的動機：

《溪園六記》，錄其五請教。第二記為〈灑園記〉，尚在蒲，俟另錄上。大約諸記成於率爾，第以寫眼中丘壑、胸底荊榛，無駭俗驚世之語。然

⁴² 明·龍膺：〈勝果園記〉，同前註，卷 7，頁 185。

⁴³ 同前註，頁 181-184。

而久羈異國，信美興咨；每念故國，莊吟轉劇。乃知鄉土之懷，垂老為篤，而避人之地，從古為宜，無如我桃花源也。花源最勝處，又唯漁仙，二千年竟為我有。即今天時人事，大有可虞。吾憶吾園，真成樂國。時一披對拙記，聊以豁此畸愁。⁴⁴

可知，在異國是紛紛簿案的羈束，在故國是鼓枻花溪的逍遙，兩者對照之下，使得龍膺迫切地渴望返還鄉園。然而，儘管他在書信裡一再提及對灑、綸二園的念想。⁴⁵他對家國的憂慮以及對舉薦者的感念，皆使得他孜孜矻矻地堅守職責。於是，他只能試圖以紙上園林的臥遊，構築出記憶與想像中的樂國，來取代被目所見的百姓之苦。

那麼，灑園、綸嶼作為他念茲在茲的兩座園林，各別具有什麼樣的意涵？用於往返的交通工具，桃柳航，對於二園的串連又起著何種作用？筆者認為，灑、綸二園在空間的意義上，一則以釋，一則以道；灑園可以說是他在柳湖邊上建立的池上佛廬，而綸嶼則是他在桃源縣漁仙洞所闢建的群真窟宅。至於桃柳航者，則為兩座固著於一方的園林提供了流動的可能性。由灑至綸，由綸至灑，其中所變換的不只是園林中的景色，也不僅僅是空間的意涵，同時也是他對自我角色認同的切換，桃柳航帶給他不需受外在假名拘束的真實灑脫。此外，串連灑綸的汨汨流水相對於園池的封閉，多了一分輕巧；而相對於江湖的險惡，則多了幾分安穩。龍膺一竿一笠，可行可止，似能解脫塵網，遊戲人間。

灑園的闢建，始於龍膺母親的過世。園內的主要建築為功德母庵以及千秋鑿閣。其位址在武陵縣漢壽鄉，柳湖之濱。袁中道曾經應兄弟二人之請，在萬曆三十七年（1609）前來遊賞。在《遊居柿錄》中即有一段關於灑園位址的記述：

⁴⁴ 明·龍膺：〈與平陽守傅咨伯〉，同前註，卷 26，頁 475。

⁴⁵ 見書信〈與楊文弱計部〉、〈答周句憇侍御〉、〈與李汝藩小侯〉、〈答楊師〉，俱收入龍膺《綸灑文集》第 25 卷，今舉其二為佐。〈答周句憇侍御〉：「國家多故，時勢紛拏，則復時時抱婺緯之恤。夢魂怲怲，飛繞綸灑間。」頁 462。〈與李汝藩小侯〉：「吾家灑園、綸嶼，猿鶴怨人，令逋客怲怲心動，第不知異日脫此樊籠，尚可作江湖浪游，與足下一大醉於燕磯、牛首之間否？」頁 468。

晤君御于勝果園，同至北莊，可十里許。莊在青溪、黃溪之中，湖水當其面。共一門入，左則功德母菴，有樓可望梁山；右為灑園，高閣曲房，排當甚有方略。溪繞四維可十里，泛小樓船其中，兩岸喬松，古木蔽虧，空山無人，好鳥和鳴，應不減輞川。⁴⁶

上述引文中的北莊，是龍膺在漢壽鄉的田莊。⁴⁷入莊門之後，即見寶月樓，供水月大士墨像。負樓而西，即中道所謂入門後左側，有功德母庵，奉三佛金姿，殿隅則供先人遺像。入門後右側，即龍膺別業，有漚息草堂、千秋鑿閣、松濤軒、安隱榭及廬舍五楹可供寢處。園而外，有青溪、黃溪抱灑園如腋，兩溪停匯處作放生池，池側有樂魚臺，可覽湖上風光。

引文中提到的功德母庵是灑園中相當重要的宗教場域。不論是建設緣起、命名緣由，都與他們家族的佛教信仰、宗教活動具有緊密關聯。功德母庵作為佛廬，早在龍膺父親過世後即存在。當時，龍膺、龍襄兄弟為了陪侍母親，遂於父親的玄扈石室旁側結精舍以習梵唄。當龍氏母親亦逝世之後，兄弟倆則將佛廬搬遷至灑園，所謂：「逾五年，而先淑人見背，乃徙佛廬於池上一園。」⁴⁸

根據碑記所載，搬遷是為了尋找更適宜的地點，並以功德母庵為重心，將灑園闢建為一處以宗教修持為主的園林。其曰：

先計部玄扈公授記普陀，皈依乾竺。先宜人唐晚發信心，專持佛號，無疾危坐，稱阿彌者三乃瞑。膺不肖少從方外游，稱佛弟子，邇緣孺慕二人，尤弗忍背違先志，思一永之，且以薦冥福焉。爰扶廣柳歸，輒從草土中遍搜溪山最勝，無如我漢壽鄉柳湖之濱也。⁴⁹

⁴⁶ 明·袁中道著：《遊居柿錄》，收入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2，頁1129。

⁴⁷ 見〈樂志〉：「武陵山水奇勝，與桃花源鄰。予復有林壑癖，幸席先人產，可貽子孫以安。予肇卜別業漢壽鄉，得田三十畝，無憂旱潦，庶幾稱良，足供香積。」明·龍膺：《論灑文集》，卷22，頁386。

⁴⁸ 明·龍膺：〈杜越凡居士傳〉，同前註，卷8，頁210。

⁴⁹ 明·龍膺：〈功德母庵碑〉，同前註，卷6，頁145-146。

可知，龍膺建設功德母庵除了是為父母追薦冥福之外，更重要的是為承繼、延續父母的虔誠信仰。尤其是他的父親曾因焚經之故，誓願奉齋持戒。⁵⁰

至於庵名之所以命作「功德母」，一方面是龍膺用以惕勵自我「信心」的重要性，典出《華嚴經》偈語：「信為道元功德母，增長一切諸善法。」⁵¹ 另一方面，則與他對父親的追懷有關。他在萬曆十六年（1588）擔任溫州府學教授時，曾經將自己在官署中的誦經處命名為「功德母」。他在與父親來往的書信中提到：

嘉禾楞嚴寺近鑄三藏諸法寶，多善本。兒經其地，以月俸購之，攜來署中，暇則翻閱，少有解悟，因名誦經處曰「功德母」。無咎作八分書，居然僧舍也。因憶大人坐逸我亭中，參定慧，觀真見如來，兒於習靜時，恍如侍膝下。第終不如脫此塵根，歸作團圓頭，說無生話，為無量歡喜耳。⁵² 當時，他將頌經處命名為「功德母」，乃是在習靜的修持中，連結自身陪侍父親參悟定慧的記憶。在廿年之後，龍膺仍然選擇將灑園中的佛廬命以「功德母」，明顯承繼著過往回憶。

灑園建成之後，龍膺經常在園林之中研讀法藏，與居士、法侶參禪應辯。他曾與諸禪衲相互詰難，並提出自我對經典的詮解，將其編纂為《金剛經摘解》，⁵³ 亦嘗因為讀經至「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一語，有所頓悟，而曰：「大自在，大自在！又有什麼病來？諸人到這裡，還信得過灑居士麼？」⁵⁴ 也

⁵⁰ 見〈補陀靈應傳〉，明·袁中道著：《遊居柿錄》，收入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卷2，頁1119-1120。

⁵¹ 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年），第278冊，卷6，頁433。

⁵² 明·龍膺：〈報家大人平安信〉，《綸灑文集》，卷24，頁425-426。

⁵³ 見〈《金剛經摘解》序〉：「萬曆甲寅嘉平月，結集禪衲，於功德母庵莊諷《華嚴法藏》，以百日為期，夜則延予法堂，參究宗旨。余於除夕語諸禪者：『昔宏忍大師，謂北方《金剛經》於見性門最為方便，然義實元奧，多所未了。』乃為講說一遍，隨眾詰難，粗為剖解。侍者遂逐段記之，集而成秩，命曰：『摘解』。」同前註，卷2，頁55。

⁵⁴ 明·龍膺：〈灑居士抱病山中〉，同前註，卷15，頁311。

曾作為功德主，延請沙門大德，弘揚《華嚴》法旨，並為禪期募化籌措，撰寫〈募化結制華嚴百日禪期疏〉⁵⁵一文。又嘗於功德母庵中開示行者，撰〈功德母庵示眾〉⁵⁶一文。其中，他與杜越凡居士更是相互引為法門知己。功德母庵裡的方丈室便是專為居士所設。其曰：

會予歸自塞上，卜築瀝園，日習禪定，拉居士為法侶，共參究此一段生死大事。蒼髯林下，碧繼溪頭，時舉一二轉語相印，揚眉瞬目，互有發明，喝棒機鋒不落空。有一夜對話，質難數回，直搗嶠函，決破關機子，令予一片疑石，划然墮地。於熱惱海裡，建一清涼法幢，相顧而笑。……奈何知居士者，唯眇予一人，而知予者，亦惟一居士耶！⁵⁷

由上述可見龍膺與杜居士之間的深厚情誼，以及兩人機鋒銳利的相互辯答。雖不敢說藉此便能參透生死大事，然而對於梳理心中困惑，當也有益。由此可以說明，龍膺構建瀝園，乃是將其視為一處以研讀法藏、習靜修持為目的的莊嚴佛土，而他本人也確實於法門有所深入。

他曾經期待自己與兄長龍襄能夠像王維、王縉一樣，在園林、在山水，也在佛法之中攜手共度。對他來說，雙親已逝，京弟年幼，唯獨曾經一同臥起、讀書的兄長能夠與他在人生的路途中繼續地相互扶持。龍襄晚歲皈依釋氏，其見瀝園山水清勝，曾經有意構築草閣依傍其側，與膺共眺柳浪煙水。可見〈哭吾兄文〉曰：

吾治瀝園青溪上，即所稱功德母庵。兄亟賞山水奇勝，亦卜一小園山之南，語吾割一隅拓之。兄擬構草閣，眺柳浪煙水，命吾書其額曰「歛湖割勝」，吾意此地為吾兩人頤老之所，如摩詰兄弟之有輞川也。兄今捨此湖山矣，異日弟歸，子立松下，將不令溪流嗚咽，雲壑含淒乎？慟哉！⁵⁸

⁵⁵ 明·龍膺：〈募化結制華嚴百日禪期疏〉，同前註，卷 18，頁 345-346。

⁵⁶ 明·龍膺：〈功德母庵示眾〉，同前註，卷 15，頁 312-313。

⁵⁷ 明·龍膺：〈杜越凡居士傳〉，同前註，卷 8，頁 210。

⁵⁸ 明·龍膺：〈哭吾兄文〉，同前註，卷 11，頁 261。

龍膺未曾想到，萬曆三十八年（1610）兄弟二人在功德母庵的餞別，即是他們的最後一面，此一念想，終成幻泡。他的兄長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溘然長逝。當時龍膺擔任西寧兵備，雖感哀痛卻又不能拋下任職，歸返武陵。不料，亡兄之戚未已，流言蜚語又起。隔年，兵科張給事上奏彈劾，以「豈欲其賦詩退虜乎」⁵⁹諷刺龍膺無法勝任軍事。於是，他在憤懣之下，隨即連上兩道乞休公文，懇切求歸。

回到武陵之後，他一方面卜築瀝園，日習禪定，翻閱藏經；另一方面也開始積極地建設他的最後一座園林。綸嶼，在桃源縣漁仙洞一帶。早在他出使西寧、甘肅之前，便曾多次前往桃源縣遊覽。萬曆三十七年（1609）春日，他與二三好友為桃花源之遊，當時看見一巨石高數丈，橫百餘丈，形狀類馬，龍膺即嘆曰：「安得此石置之几席乎？」⁶⁰此後遂誌之難忘。同一年，袁中郎、中道兄弟與龍襄亦嘗往遊桃源漁仙。中郎嘆道：「他日買山，當以此中為第一義也。」⁶¹袁中道亦有感而發：「予謂近此者不必更置園亭，但于漁網溪上作屋三間，而以一舟往來穿石、水心崖間，即為天下第一名園矣。」⁶²最終，這些念想都由龍膺一人囊括於綸嶼的構築裡。

萬曆四十一年（1613），龍膺從塞上回到武陵之後，即邀集好友再續桃源舊遊，以賣賦錢為買山資，購得瓮城一地。其記曰：

逾五年為癸丑，秋杪，復偕朋好續舊游，則見寺閣頽圯，灌木翦拜，令人愴然。……而瓮城無恙，石梁尚覆，榛莽如故也。以有他期，夙歸城市。至之明日，地主人為肺腑戚，亟遣使持左券售予，謂其主孀孤而業

⁵⁹ 明·龍膺：〈乞休公文〉，同前註，卷23，頁417。其曰：「詞燦珠璣，筆搖星斗，亦武陵名士。然蒙議不羈，恣縱無檢，山人墨客，出入其門。漸操是非之權，巧為剝削之計。處之以甘肅，豈欲其賦詩退虜乎！」

⁶⁰ 明·龍膺：〈石梁閣記〉，同前註，卷7，頁190。

⁶¹ 明·袁宏道：〈由水溪至水心崖記〉，《瀟碧堂集》，收入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13，頁1155。

⁶² 明·袁中道著：《遊居柿錄》，收入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卷2，頁1128。

遼遠，租率稽逋亡，所詰願得善價耳，予喜而倍償之。⁶³

龍膺此次購地買山，實是水到渠成。再根據江禹疏〈買山說〉以及周聖楷〈漁仙洞莎羅庵賦並序〉二文，可知他在隔年（1614）又購得倒水巖十二峰，漁仙洞地。他的快意可見於〈買山說〉一文中：

歲甲寅三月，余同伯孔游，最賞心者為穿石、倒水一帶。漁仙洞居其中，而慨建置未雅，命名不根，為山靈辱。是時灑公亦游而樂之，因購此地。不慧入郡城，方誇其勝，而灑公以書復我，曰：「倒水十二峰，以作我籬落下物，實以買賦錢為買山資，君得無妒我否？」⁶⁴

由上引諸文可知，袁宏道兄弟、龍膺兄弟以及江伯通等多位友人，皆以穿石、倒水一帶為桃源最勝。其中，又以漁仙洞最得龍膺之好。箇中緣由，除了山水之勝以外，或許跟漁仙寺的修整不無關聯。漁仙寺在隆慶四年（1570）曾經歷一次修整，主事者為於文徵以及鄒善，二人捐廩布金以新締構，而揮毫寺額者即龍膺父親。⁶⁵四十餘年之後，龍膺兄弟又應於文徵後人之請，撰寫〈修漁仙寺募緣疏〉。由此看來，龍膺與漁仙一地的相遇與相知，未嘗不可謂之宿緣。

從倒水巖十二峰至漁仙洞，其間林巖，不可勝數。膺曰：「吾於百十中拔之，得巖壑天巧神奇可稱洞天者五」，⁶⁶分別是南極洞天、北真洞天、西靈洞天、東華洞天以及中黃洞天。龍膺以道教天宮之名命之，顯然有視綸嶼為仙境之意。所謂：「其在方內，宛置五嶽於一區；其在海上，則南極一崑崙。而東華、中黃，何減閩風玄圃？」⁶⁷實有納天下於掌中，又傲比天上神仙之氣魄。

⁶³ 明·龍膺：〈石梁閣記〉，《綸灑文集》，卷7，頁190-191。

⁶⁴ 明·江禹疏：〈買山說〉，收入清·唐開韶、胡焯纂，劉靜、應國斌校點：《桃花源志略》（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卷4，頁107。

⁶⁵ 見〈修漁仙寺募疏〉曰：「隆慶庚午，吾鄉先輩于夢玄刺史公與參知穎泉鄒公，……穎泉公乃捐餼廩，屬刺史公布金締構。……先民部玄扈公為書『妙光玄閣』、『源陽仙隱』諸額，亦既煥然矣。復召野衲居守，奉香案，為之置田三十餘畝。」明·龍膺：《綸灑文集》，卷18，頁344。

⁶⁶ 明·龍膺：〈綸嶼記〉，同前註，卷7，頁196。

⁶⁷ 同前註，頁197。

對於綸嶼的自然天成，龍膺一方面為其刈茸除穢，還洞壑以本來面目；另一方面，則倚傍著山林地原有的曲直曠奧，築建亭閣以妝點山水。然而，相對於人為的造設，他顯然花更多的心力在自然景觀的命名。例如：灑公洞、虎拜石、玉壺洞、紫竹灣、紫霞巖等等，或因形、或因色而名之。透過命名，龍膺以自我的審美理解，賦予此地自然以人文意涵，同時也藉此貞定了自我與空間之間的關係與意義。如其在〈山水〉中所言：

昔人謂：「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此自會心語。而繼之曰：「何必居籬落下，然後為己物？」覺有寒士相。……雖曰千秋萬歲後，未知籬落裡更幾主人。然而主人未必妙解山水趣，即解而又未必能名理能文，能名理能文而又或苦貧乏，頗領無三徑資，弗能為山水主。以故東林諸勝，卒賴慧斐諸子以傳，而千秋萬歲後，亦無不以匡廬諸山水為慧斐諸人籬落下物，不聞諸名流貪也。第挾山水為己物，不傷為廉，然實與千秋萬歲人共有之。⁶⁸

言下之意，龍膺即所謂解山水趣、能名理能文，又有三徑資者。由此可以想像，他撇除掉「舊為好事斲者」之洞壑，另選自己認可之天巧神奇者，並處處誌之、名之的行動背後，正是他欲山水洞壑以己名傳之，並與千秋萬歲人共有之的冀盼。⁶⁹

龍膺對山水、對園林的熱情，最終成就了他在武陵、桃源的三座園林。尤其灑園、綸嶼更是他晚年重要的心靈寄託。如「夢繞灑園松韻裡，秋驚汾渚雁聲中。」⁷⁰「予家漁仙是仙島，萬樹碧桃花更好。」⁷¹「雲山渺何處，夜夜枕邊過。」⁷²等等詩句，無一不傳達出龍膺遠在異土，對綸灑二園的思念。不過，

⁶⁸ 明·龍膺：〈山水〉，同前註，卷 22，頁 386-387。

⁶⁹ 見〈萬壑臺〉詩：「漁仙巖洞闢鴻蒙，萬壑千秋屬灑公。輞水香山堪並勝，宗風仙骨許誰同？」明·龍膺：〈萬壑臺〉，《漁仙雜著》，卷 17，頁 717。

⁷⁰ 明·龍膺：〈入晉咏懷〉，《晉寧小草》，卷 16，頁 680。

⁷¹ 明·龍膺：〈醉菊歌長句〉，同前註，卷 16，頁 688。

⁷² 明·龍膺：〈伏雨後望華條諸峰漫懷鄉國二首〉，同前註，卷 16，頁 704。

兩座園林一則以釋，一則以道，若依他所言：「吾晚節事竺乾古先生，斥十仙為外道」⁷³的話，他如何綜合二者，合理化自己闢築淨土、洞天的作為？

他在書寫自我的兩篇傳記〈偃骨無學人傳〉以及〈綸灑先生傳〉裡，便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龍膺如何以他身體的外在特徵「偃骨」，⁷⁴以及串連兩園的交通「桃柳航」，來強調自己可仙、可佛的豁達與自由。在〈偃骨無學人傳〉中，無學人本志在灑園習禪定，閱《楞嚴》、《圓覺》諸經典，然而在親友的關懷之下，他勉強自己居於城郭、食用葷食，不出兩個月即苦痛難耐，其曰：

居不兩月，萎頓中惡，心忪忪作悸，甫交睫輒喘飽，有如一物奔沖而上，直抵心胃間，如杵如舂，躍長衾中，大叫狂走。久之隱軫墳起，按之如石，大如卵，中坎橫亘。……及取几上一帙讀之，為《酉陽雜俎》，內載玉格有曰：「名在星書者，胸有偃骨相，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無學人掩卷笑曰：「有是哉！有是哉！吾胸間隱軫如石橫亘中坎者，豈即所稱偃骨耶？」⁷⁵

龍膺將胸前橫亘之凸起，解釋為上仙之偃骨。而後根據書中記載，強調自己從今而後只管靜心無念，便可俟道自至，永脫煩惱桎梏，是以其曰：「仙可也，佛可也；不必仙、不必佛可也，夫何病？」⁷⁶於是，倚傍著胸中偃骨，龍膺便消弭了自我在仙佛之間身分認同的歧異。至於在〈綸灑先生傳〉裡，他則透過實地交通的串連，通過身體的移動，具體地展示自己在價值認同間的自在解脫。傳曰：

夫灑以一笠而曰公，志為開士流也；綸以一竿而曰叟，志為漁父流也。往來上下，時嶼時園，恒以一航載竿笠圖書而狎煙水。視向者絕無風波

⁷³ 明·龍膺：〈偃骨無學人傳〉，《綸灑文集》，卷8，頁213。

⁷⁴ 偃骨的描述尚可見於〈塑詰〉：「予額有赤珠如摩尼，背有黑子如肉芝，胸有偃骨餐瓊飴，則豈塑氏所能窺？」明·龍膺：〈塑詰〉，同前註，卷22，頁384。

⁷⁵ 明·龍膺：〈偃骨無學人傳〉，同前註，卷8，頁211、213。

⁷⁶ 同前註，頁213。

之惡，無簪組之累，……故人求先生於灑，曰：「先生學無生，為佞佛者乎？」而先生之綸矣。求先生於綸，曰：「先生學長生，為神仙者乎？」而先生之灑矣。⁷⁷

在桃柳航的擺渡中，龍膺以無法被掌握的行跡，來迴避外在他者強加的價值判斷。卸下佞佛者、神仙者的身分，龍膺無需向他者解釋自己的行動，也無需考慮他人的眼光。所謂「名，假也，予自有無名氏真主人在。第幸得長主綸灑之盟，予不死矣。」⁷⁸有趣的是，龍膺特別在傳記末尾，又借「好事者」之口來強調自己以儒者為本的身分認同。曰：「先生篤君父，習文武，儒也。而托之乎仙與佛者也。然先生非世所謂儒，而亦不棄為世儒也。」⁷⁹由此可以想見，不同的園林對龍膺來說雖有著相異的空間意涵，但背後所要抒發的仍舊是古往今來讀書人在仕宦途中所遭受的不遇之悲。是曰：

予生平於功名富貴之際，若有所沮焉而不與，即坎壈拂抑無聊之候亦數數。逢知己特達之遇，目為異人，欲挈而登之九天之上，而主者復若靳也。即今通籍垂四十年，尚滯藩臬簿書，亦慕厄矣。乃於山水泉石之勝，率往往不求而得，不召而來，不費資力啟吻，而挈以畀我，豈造物者故投其所好乎？然又皆人棄之若無奇者，及予得而闢之，而人爭以為奇也。⁸⁰

讀書人，或者說心懷家國的儒士，因無所用於世而選擇以自然山水的瑰瑋壯闊，以身體力行的園林興築、草木澆灌，繼而以命名、以書寫的方式寄託心志，抒發不遇之沮。這樣一個有關仕隱出處的課題，早已不甚新奇。然而，痛苦並不能比較。縱然每一個在科舉制度底下的讀書人都可能仕路受挫，縱然他們有眾多同樣失意的前輩典型可以撫慰自己，然而這都不能改變他們在人生路途中

⁷⁷ 明·龍膺：〈綸灑先生傳〉，同前註，卷8，頁214-215。

⁷⁸ 同前註，頁215。

⁷⁹ 同前註。

⁸⁰ 明·龍膺：〈石梁閣記〉，同前註，卷7，頁190。

所遇到的每一次挫折，都是唯一的一次。這些挫折與傷痛，是在他看似豁達、超脫的話語背後所要留意的。勝果園如此，瀝園、綸嶼亦然。

三、半生戎馬：《蒙史》的編纂與湟中園亭的建設

龍膺一生的仕路輾轉多方，其中與他地緣最深的非湟中莫屬。萬曆二十三年（1595），他隨田樂出征，即以湟中三捷的輝煌戰績，為備受紛擾的西寧捎來安定。四年的征戰經歷，使得他對此地風土多了幾分的熟悉，當時他曾與劉敏寬共同編纂《西寧衛志》，寫下了他們對邊防的憂心。而後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他在京師遭受黨爭波及，⁸¹ 授任甘山兵備分巡道副使，又一次的往來於甘州與西寧之間。待在湟塞約莫半年的時間裡，他積極地投入當地建設，構置以「蒙惠泉」為中心的公共園亭，並將相關的建物記文以及他對泉、茶的品啜心得，彙整為四卷一冊的《蒙史》。

短短的數月之間，龍膺合眾人之力開鑿了蒙惠泉，構築淡空庵、清寧堂、枕漱軒、樂眾軒以及醒翁亭、丈人亭、醉歌亭、達勝亭等等四座用於調節奔奏之勞的候亭。此外，尚有香水寺與北禪寺兩座佛教建築的修建。就體量而言，龍膺在湟中建設的園亭，規制並不繁複。然而，他與湟吏詩咏其間的行動，以及他在命名、書寫中寄託的情志，一同豐富了此地的空間意涵。可以說，湟北園亭一方面是他在公務之餘，與地方官僚、戎馬壯士觴詠酬酢的文化場域；另一方面也是湟民休憩泳游、汲取清泉的日用休閒場所。

其具體規劃如下。從湟城北門出，東址即「蒙惠泉」。泉自石出，分流為二，龍膺不欲眾流混淆，遂合分流為一池儲之，可渡舟筏。循池植柳，逾池而

⁸¹ 見〈腕讓〉：「庚戌之秋，需次輦下，偶宣城史氏為庵佞佛，問名於予，予命以『七枝』，遂書其額。不圖黨人攻史氏，而以其波及我，猶塵塵以『少年文酒，延納細過』薄責我，典邊者爭之，曾不減予勞也。」明·龍膺：〈腕讓〉，同前註，卷 22，頁 389。

北為渠，渠逼井。歷井後，曲折而南，有巖負城若广，跨广而亭，是為「醒翁亭」。亭側築一候，名「達勝亭」，以蔽兩日。越醒翁亭而東，眾石攢立，陟石拾級而上，東折為「淡空庵」。越庵而東，即「清寧堂」。

清寧堂者，湟峽、渠水若襟若抱，所見之景夏秋、冬春各擅其勝。庵、堂之間，有楊別駕之「樂眾軒」。歷清寧堂之南，循徑下，稍西折，有巨石獨處塊然，又有群石列之左右，於茲地設亭，是為「丈人亭」。倚欄四眺，可見千頃沃壤。另，「枕漱軒」根據記云：「軒實礫清流而跨群石」，⁸²推測亦在丈人亭近處。丈人亭左，又築一亭候，使來往之師旅忘倦，是名「醉歌亭」。而清寧堂之東，有寺為「香水寺」。門入，稍南折而東，有殿中峙。殿前有圓阜，輔以危岫，湟水、渠水、泉水相匯於前，即龍膺於北泉處所關之工程。

以下，筆者將以《蒙史》為主要材料，輔以相關詩文如《湟中詩》、〈醒鄉記〉等文本，從中釐清不同建物之間的命名寓意以及聯繫關係，梳理龍膺在公、私不同的面向上，如何以建設活動、文學書寫賦予此地園亭意義。

（一）《蒙史》的編纂與湟中惠政

《蒙史》四卷，卷一為建物書寫，卷二至四分別為泉品、茶品、啜品。二至四卷的內容，包含龍膺的平述見聞、讀書筆記、他在湟中對泉、茶的發明與軼事，以及對好友羅廩《茶解》的援引。可惜，四卷本《蒙史》似已亡佚；因此，筆者僅能根據《蒙史》的序文，來推斷其中收錄的篇目作品。其曰：

《蒙史》者，醒翁治兵多暇，著而勒之北泉者也。泉稱「蒙惠」，故名因之。泉在湟之北，其上為庵者一，為堂者一，為軒者二，為亭者四，各有記，其續構精舍並碑焉。繫以品者三：曰泉、曰茗、曰獸。悉述舊聞，合為《史》，得卷四。⁸³

由引文中所謂一泉、一庵、一堂、二軒及四亭各有記的說法看來，可以推測

⁸² 明·龍膺：〈枕漱軒記〉，同前註，卷7，頁162。

⁸³ 明·龍膺：〈《蒙史》序〉，同前註，卷2，頁59。

《蒙史》卷一收錄的是〈湟北蒙惠泉記〉、〈北泉清寧堂記〉、〈醒翁亭記〉、〈枕漱軒記〉、〈丈人亭記〉、〈醉歌亭記〉、〈達勝亭記〉、〈樂眾軒記〉，其中淡空庵並沒有獨立的記文。至於「續構精舍並碑」者，應為〈北泉香水寺碑〉。此外，龍膺在湟中與建置相關的書寫尚有〈醒鄉記〉、〈淡空庵偈〉與〈建北禪約〉，這些作品是否收錄在《蒙史》卷一，目前並無相關線索。至於卷二至卷四的泉、茗、歡三品，所指明確，較無爭議。⁸⁴

關於《蒙史》的版本，除了可以參考點校本《龍膺集》之外，尚有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二卷本《蒙史》，收入明代喻政所編輯的《茶書》裡。⁸⁵ 二卷本的卷首刻有朱之蕃撰於萬曆四十年（1612）的〈蒙史題辭〉，卷上為〈泉品述〉，卷下為〈茶品述〉。〈茶品述〉的內容經過增補之後，於四卷本中被區分為茶品以及歡品兩個部分。筆者將二者進行比對，發現在四卷本的〈茶品述〉及〈歡品述〉中，有三個段落經過增補：〈茶品述〉中從「出鑄不扇」至「過此則湯老不堪用」一段，⁸⁶ 以及「畀茶用熱湯洗過」至「以上見《茶解》，述其略」一段，⁸⁷ 為二卷本所無，乃龍膺摘自羅廩《茶解》的段落。另外，在〈歡品述〉末尾，增補了「膺居塞上，苦佳茗難繼，於夏初採枸杞茶，制如茶法，烹亦如之。味苦而清，且能滋益。久之，色轉香美，名曰杞茶」⁸⁸ 一段，是龍膺在湟中研發杞茶的記錄。

透過《蒙史》大略的形制，讀者應可略窺龍膺對茶飲的鑽研與重視。那麼，他究竟何故對泉茶之事如此執著？除了蒙惠泉以外，他更耗費許多財力、精力進行相關的建設活動，甚至為此留下一部《蒙史》著作，其用心何在？

⁸⁴ 以下為行文之便，仍將《龍膺集》中所收錄的湟中建物記以及泉、茗、歡三品，視作整體，並以四卷本《蒙史》稱之。

⁸⁵ 明·龍膺：《蒙史》（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萬曆四十一年〔1612〕刊本）。影像檔參見：<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2554207?tocOpened=1>。

⁸⁶ 明·龍膺：〈茶品述〉，《綸隱文集》，卷20，頁368。

⁸⁷ 同前註，頁368-369。

⁸⁸ 明·龍膺：〈歡品述〉，同前註，卷20，頁372。

根據《蒙史》三品的體例，此書與《茶經》、《酒經》、《花譜》類屬同一種書寫系統。⁸⁹ 乃文士們因著自身癖好，將單一物類的知識經驗與發展過程集結為冊的成果，展示了文士對閒雅文化的經營。然而，由於龍膺的官吏身分以及所針對的閱讀對象，使得《蒙史》的撰作動機不僅僅是興趣使然，同時也是他對教化蒙昧的實踐以及具體政績的記憶留存。可見二卷本朱之蕃的〈蒙史題辭〉曰：

頃治兵湟中，夷虜欵塞，政有餘閒，縱觀泉石，扶剔幽隱，得北泉甚甘烈。取所携松蘿、天池、顧渚、羅芥、龍井、蒙頂諸名茗嘗試之，……乃知天地有真味，不在醴酪姜椒、羶腥鹽豉間，而雅供清風，且推而與擐甲關弧、荷蓑披毳者共之矣。⁹⁰

藉由朱之蕃的記錄，可從中瞭解龍膺試茶的經過，並欲將其推而與軍民共享的意圖。而龍膺將此清境勝事傳予當地湟民的起心動念，則可見《蒙史》序文：

湟居絕塞，不產稻粱，惟藝麥糜稗菑，啖牛羊潼酪，與羌習類。然非茗飲，則病暈不可活，而茶又無佳種，率官商採自楚蜀者，雜蒨蒟搗之，蒸如餅，堅如鐵石。製竹為籠，實其中，用刀椎始碎，蓋資以市番馬，為戰士需。商挽茶籠至，典者計算千百，半入所司，半令售於市，即民間暨羌氏所習啖者也。濃沉如墨如丹，而又以酥乳糝之，絕不知有烹法，亦無所擇水矣。下吏執役者，又率不櫛不沐，汗垢漬毛衣，黷若廁踰，弗可近其人。甘溷濁，乾糲如飴，又安所事水？⁹¹

由上述可知，茗飲乃是湟人與羌族治療暈症不可或缺的事物。然而，當地施行茶馬互市，茶餅需要仰賴官商自外地採買。不僅茶無佳種，不知烹法，又於取用之水毫無揀擇。此外，擔任煮茶之役的官吏亦無衛生概念，藏污納垢難免盡

⁸⁹ 見〈《蒙史》序〉：「《史》視《花譜》、《酒經》，似尤淡而不厭，爾觀勿謂癡狂人效玉川子『三碗搜枯腸』，作此淡語。」同前註，卷2，頁59。

⁹⁰ 明·朱之蕃：〈蒙史題辭〉，收錄於明·龍膺：《蒙史》。影像檔可參見：<https://dl.ndl.go.jp/pid/2554207/1/48>。

⁹¹ 明·龍膺：〈《蒙史》序〉，《綸灑文集》，卷2，頁59。

入茶茗之中。於是龍膺作泉、茗、歡三品，即在教導湟人如何辨別水之澆淄；再者傳授茶之品類，使人盡知宇內別有一種嘉茗，非酥乳可摻；並以東南之習為例，指出煮茗當手親為之，乃為雅供。最後，藉前賢往跡的記載，盼能引領讀者登堂而入茶室之境，達到「上者可從味因漸證湛明妙性，其次亦可稍滌煩惱塵根」的效果。⁹²

龍膺在湟北開鑿的蒙惠泉，正是實踐一切的基礎。他將泉水以蒙、惠為名，前者是以蒙卦中的象、彖之辭來形塑源泉潤澤，長養萬物而不居功的特質；後者，則是肯定北泉堪比錫山惠泉，又強調他開鑿此泉，嘉惠湟民的用心。至此，龍膺撰作《蒙史》的用意昭然：即欲以泉池之關、茶水之知，啟湟人蒙昧之智。而隨著泉水的開關所陸續興造的建築，除了兼具風景之麗以及實用之效以外，同時也寓託了龍膺遲暮再入湟中的生命感懷。

對龍膺來說，昔者武功，今者文教，湟中始終是特別的。十七年前，他與田樂諸將出征，掙得一片安穩淨土；十七年後，他與地方官吏一同展開文化的建設，如修築堤防，遷徙井渠以免氾濫之苦；⁹³ 關心稼禾，為湟民祈雨；⁹⁴ 或是建造候亭以調節師旅、驛遞之勞等等惠政，於是百廢俱興，民不知有虜而耕殖日繁。不論地方官吏，或者當地百姓，對龍膺都抱持著感懷之意。如楊別駕、祁貳師等人稱頌道：「吾儕以及湟人士蒙使君賜，有如此泉矣。」⁹⁵ 「往事幸躬不閱而閱今，茲甫數月而百廢俱興，慈闈渥洽，其殆老氏所謂『清靜寧壹，無為而民自化』者乎？」⁹⁶ 百姓們甚至為他打造了一尊塑像，放置於清寧堂中

⁹² 同前註。

⁹³ 見〈北泉清寧堂記〉：「隄池而北為渠，灌東北一帶沙壤可十里。渠逼井，而溢嚙城趾，稍北溢輒氾濫沖決，害禾稼，村民患之。予乃首集版鍤，徙稍北，障以堤，足永恃為一村鄭白矣。」明·龍膺：〈北泉清寧堂記〉，同前註，卷7，頁158。

⁹⁴ 見〈祈雨告文〉：「今湟民既病秋冰雹，獲甚儉，春無能播種，播已又久弗雨，其尚克有夏，民且饑色。率巫舞雩，禱於山川鬼神。」明·龍膺：〈祈雨告文〉，同前註，卷13，頁279。

⁹⁵ 明·龍膺：〈湟北蒙惠泉記〉，同前註，卷7，頁158。

⁹⁶ 明·龍膺：〈北泉清寧堂記〉，同前註，頁159。

祭拜。⁹⁷而他自己在〈再乞休公移〉中為駁斥他人對自己的詆毀時，亦不禁忿忿表示：「而又胡然士民父老，卒伍兒童，萬口一詞，傾心愛戴，聞來則攀而喜，聞去則泣而留，職亦何德於邊塞，而能使之人人若此乎？」⁹⁸種種皆可見龍膺對地方的投入受到極大的肯定。

可以說，湟中再履雖是宦途坎坷，但也難得可貴，人情與物情因此兼備。於是在具體的政治舉措外，他也特別期待能夠透過持續地書寫，尤其是《蒙史》的編纂，來為自己留下聲名。即如〈達勝亭記〉所載：

昔羊太傅鎮荊襄，多惠政，每風日佳輒造峴首，置酒言咏，終日不倦。……予癖山水與羊公同，第五十無聞，髮且種種，上無臆益於王國，下無聞惠於吏民，對茲巖泉，殊有慚於叔子。卿輩濟濟以智略才勇著稱，而又能從予酌清泉，識此種淡泊味，且亦能樂予之樂，復推予樂以公湟之人，不惜胼胝拮据，共趨厥事，庶幾賢達勝士之流亞也。勉旃自樹，令千秋而下，與鄒湛諸人並傳茲山重矣。⁹⁹

龍膺引羊祜之典，不僅在抒發異代的同情共感，同時也正有意以羊祜自比。藉由強調羊祜多惠政、有山水之癖、又負文武之才；正對應到他在此地的平亂之功以及各種善政。蒙惠泉的建立以及相關興造，不論規制繁簡，幾乎都有相應的文字作品，並及勒之於石的行動，透露的正是他欲同羊祜一般，與眾卿垂名千古的企圖。其中，他對北泉的情感寄託最是深刻，可見：「安知千秋萬歲後，茲泉茲石因誰傳？」¹⁰⁰或者是「甘泉亦有泉堪酌，何似茲泉自我開？」¹⁰¹「石勒片言應不朽，泉流千載定如新。」¹⁰²等詩句，皆透露了他對勒石留名的寄託與期待。

⁹⁷ 明·龍膺：〈塑詰〉，同前註，卷 22，頁 384。

⁹⁸ 明·龍膺：〈再乞休公移〉，同前註，卷 23，頁 419。

⁹⁹ 明·龍膺：〈達勝亭記〉，同前註，卷 7，頁 165。

¹⁰⁰ 明·龍膺：〈北園泉石歌賦示王貳守、楊貳師二君，皆舊游湟中，今始閱此，共詫稀有，因戲問之〉，《綸瀝詩集》，卷 15，頁 676。

¹⁰¹ 明·龍膺：〈將赴張掖留別北泉兼謝諸父老四首〉，同前註，卷 15，頁 678。

¹⁰² 同前註。

(二) 水石之癖與夙緣再來

以下試圖從羈旅之身的角度，觀看龍膺如何書寫自己與滙中山水的緣分。朱之蕃在〈《滙中詩》小引〉中曾指出，龍膺是以流連山水的方式來忘卻羈宦之苦，其曰：

滙之人瞻依德政，不啻郡父杜母。滙之山川泉石，亦若快睹車騎之登臨，而爭獻其奇者。疏泉甃石，泛觴臨流，招攜同志，瀹茗咏懷，時向精藍梵剎、花嶼林亭間消磨壯志。撫弄流景，忘其久在邊塵而身羈宦轍也。且讀滙中諸咏，簡遠閒適，不作慷慨嘆咤、憤世嫉俗之語，蓋得風雅之神而不襲其迹，盡〈離騷〉之致而無怨於中。¹⁰³

朱之蕃認為龍膺於政治上的失落在梵剎林亭之間得到了紓解，也因此《滙中詩》未嘗流露憤世之語。然而這一次踏上滙土，他的心情其實相當複雜。赴京待選前，他為母親守喪三年，並在灑園中靜心修持。沒有想到甫入京城即遭受黨爭波及，甚至於甘山兵備分巡道副使這樣一個遠離政治中心，又注定備嘗艱苦的職位，還是有賴知己者向朝廷力薦才得以授任。

因此，他一方面雖期許自我以報國恩、酬知己的熱情盡心為民，¹⁰⁴ 然而心中難免有所怨懟。當他眼前盡是黃黃塵土以及相異的風俗民情，不免對自我拋卻鄉園的行動感到懊悔。《滙中詩》裡即貫串著他對灑園的追懷與眷戀，如「悔脫緇衣別柳湖，溪山入夢思模糊」、¹⁰⁵「灑上鄉心切，生涯一海漚」¹⁰⁶ 等等皆是。於此同時，情緒的拉扯也讓龍膺意識到自我在修行上的侷限。如〈寄懷灑園四首〉之二曰：「年來忍辱尚微名，罄折泥塗逐世情。勘破自憎還自哂，

¹⁰³ 明·朱之蕃：〈《滙中詩》小引〉，收錄於《龍膺集》，卷首，頁15。

¹⁰⁴ 見〈再乞休公移〉：「幸承督撫過聽邊人之言，復特疏敦委疆事，滙中再履，張掖重來，豈亦謂老馬知途，鉛刀可割？職愈發感激奮發，思請長纓，以報朝廷，以酬知遇。」明·龍膺：〈再乞休公移〉，《綸灑文集》，卷23，頁418。

¹⁰⁵ 明·龍膺：〈塞上得五兄隔歲書卻寄四首〉，《綸灑詩集》，卷15，頁666。

¹⁰⁶ 明·龍膺：〈北泉雜咏十二首〉其五，同前註，卷15，頁675。

輸他枯寂學無生」¹⁰⁷以及「暮年何事戀微名？方笠團蒲有宿盟。」¹⁰⁸詩作中「勘破自憎還自哂」的瞭悟以及「何事戀微名」的叩問，代表了龍膺在脫離瀝園安穩的修行生活，重返仕宦之後，方在懊悔中窺見自我內心的真實渴望，亦即俗世間的價值肯定與聲名追求。林園的安穩與政治的實踐成為他心中的兩端拉扯，使得他在重新踏上湟中之後，隨即展開了蒙惠泉園亭的建設，並試圖在山水中紓解自己的羈旅之苦。

他對泉、石的特殊理解與情感執著，尤其見於〈湟北蒙惠泉記〉、〈枕漱軒記〉以及〈北泉清寧堂記〉之中。以下分從三個層次來進行說明。

首先，他認為泉自石出，方為上品。他雖然認同《老子》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¹⁰⁹不過，對他來說這一能夠利澤潤溉的水是有前提條件的。在他遍品諸水的經驗總結中，即認為峽水過喧，渠水過於混濁，井水則滯塞難通，只有泉自石出者，方具奇冽之質。所謂：「甲石流精以生水，故泉非石出者不奇不冽。又水必自山下，深淵細流，淳淳舒緩而出者，始為蒙。」¹¹⁰以此命名的蒙惠泉，正來自於峻嶒歷落的石塊之隙，入之於口，寒冽回甘，用於煮茶正可澡肺滌腸，一洗羶習。

再者，他更進一步界定泉石，當分別具備清、奇的特質，方能彼此成就。在〈枕漱軒記〉中，他將孫子荆典故裡「泉洗耳、石礫齒」的關注重點，轉向水石之間相互激盪、充滿力量的互動關係。其曰「流非淬以奇石，則脂漫而弗澄。石非蕩以清泉，則頑呱而不活。」¹¹¹他認為唯有「泉清、石奇」，方有激湍之聲、磅礴之力來滌除耳裡喧囂，洗蕩心中塊壘，而得以「從泉石間得大解脫」。¹¹²

¹⁰⁷ 明·龍膺：〈寄懷瀝園四首〉，同前註，卷 15，頁 668。

¹⁰⁸ 明·龍膺：〈塞上得五兄隔歲書卻寄四首〉，同前註，卷 15，頁 666。

¹⁰⁹ 魏·王弼等著：《老子王弼注》，收入《老子四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上篇八章，頁 6。

¹¹⁰ 明·龍膺：〈湟北蒙惠泉記〉，《綸瀝文集》，卷 7，頁 157。

¹¹¹ 明·龍膺：〈枕漱軒記〉，同前註，卷 7，頁 162。

¹¹² 同前註。

最後，龍膺從泉、石之間的拮抗關係，擴及至對泉、巖的個別觀照，並由山水入道，體悟「清靜寧壹」的意旨，其曰：

予觀於泉，潯然蕩塵滓如滌也，轟然燭須毫如鑒也，得清之旨焉。吾觀於巖，簸彼風濤而靡遷也，撼彼雷霆而靡震也，得寧之旨焉。徵清於水而又見其凝澄弗喧，挹之以瑤卮玉碗罔色喜，穢之以蟲沙瓦礫罔色愠。以此思靜，靜根於清乎？徵寧於巖而又見其壁立不二，纓簪車蓋，俯其下而不加埤；牛羊狐兔，陵其上而不加損。以此思壹，壹根於寧乎！維清且寧，可以通乎山水之情；維靜且壹，可以入道之室。¹¹³

在上述引文中，龍膺不再著墨於強調泉石間動態性的衝撞，而旨在呈顯泉巖不為外物所動搖的凝定姿態；並由自然而人文，將他在湟中的辦公齋署命之以「清寧」，一方面期許自我不受外境影響，另一方面也抱持著「我無為而民自化」¹¹⁴的態度，欲使湟民得享清寧之福。

除了上述對水石關係的獨特觀點外，龍膺也將自我在羈旅播遷中與水石的遭遇，視為造物者刻意的安排。柳宗元嘗在〈小石城山記〉向造物者叩問，何以將奇景藏匿夷狄，而不置其中州？¹¹⁵對龍膺來說，他在南川之捷後，又經歷宦場的跌宕起伏，重至此地，除了歸因於造物者或者夙緣之外，似乎難以找到更好的解釋。相對於柳宗元的憤懣，龍膺對於造物者的安排，除了命定說以外也帶有一種正面積極的轉化力量。他在〈北泉香水寺碑〉中提到：

類為豪有力者布以黃金，而今智者持量衡，巧者秉斤墨，乃若是中規中矩，都鴻勝而成巨觀也。噫！疑亦造物者之誠有待耶？予又怪其不生於東南名勝之區，及車馬輻輳之地，而置此沙磧，更千百年弗逢一韻士標

¹¹³ 明·龍膺：〈北泉清寧堂記〉，同前註，卷7，頁159。

¹¹⁴ 同前註。

¹¹⁵ 見〈小石城山記〉：「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唐·柳宗元：〈小石城山記〉，《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29，頁773。

其奇，又何造物者之慳耶？或曰：湟始城不克就，有蜿蜒如蛇，周城基而走，遂方圓曲折悉准之。豈神物知有今茲之役，故疏數向背暗符合耶？或曰：以待士大夫之入暴行間，而抱泉石癖者，始售茲山，羈其去志。或又曰：山川靈異，不欲以屬世俗人，而闕為人天法界，則以待護法宰官啟群迷、濟含識耳。余乃喟然曰：「自有山川城郭以來，即預定有此佛刹，且知闕自予今日矣。造物哉！造物哉！」¹¹⁶

柳宗元當年在〈小石城山記〉中提出對「造物者」的思索，最終在信與不信的兩造中，拒絕接受自我、造物者以及永州山水三者之間的繫連。而龍膺則是通過向造物者的叩問，以文中三個「或曰」的可能性，肯認自我正是造物者等待之人，從而使他能夠接受並肯定自己夙緣中即須走此一遭。例如，詩詠〈北園泉石歌賦示王貳守、楊貳師二君，皆舊游湟中，今始閱此，共詫稀有，因戲問之〉¹¹⁷的描寫，以及他在〈北泉清寧堂記〉提到：「上下數百年即具茲勝，造物乃儲以俟吾再來而堂也，益奇矣。」¹¹⁸同樣〈建北禪約〉也指出：「是役也，始以余肇修，既以余再來，工復舉。豈予宿劫中曾供無上土於湟，而發宏誓於北禪耶？」¹¹⁹諸說皆在強調山水之勝本西寧所有，卻始終不為他者所發掘，乃是有待龍膺此一知己，山水方願獻身以成佳景。

有別於柳宗元與永州山水之間的張力與衝突，遠赴邊地的龍膺，其心境更趨近於在思辨中肯認此地山水，並表露自我不欲與濁流為伍的高潔之志，乃所謂：「也知貞品忤流俗，甘溷泥沙不受憐。神物知己有時合，心賞不逢寧自全！」¹²⁰他與自然山水間的相知相待，撫慰了他重至邊地的失落與悲苦。

¹¹⁶ 明·龍膺：〈北泉香水寺碑〉，《綸灑文集》，卷6，頁148。

¹¹⁷ 明·龍膺：〈北園泉石歌賦示王貳守、楊貳師二君，皆舊游湟中，今始閱此，共詫稀有，因戲問之〉，《綸灑詩集》，卷15，頁676。

¹¹⁸ 明·龍膺：〈北泉清寧堂記〉，《綸灑文集》，卷7，頁159。

¹¹⁹ 明·龍膺：〈建北禪約〉，同前註，卷21，頁374。

¹²⁰ 明·龍膺：〈北園泉石歌賦示王貳守、楊貳師二君，皆舊游湟中，今始閱此，共詫稀有，因戲問之〉，《綸灑詩集》，卷15，頁676。

（三）醉醒之別與迷悟之辯

以下接續說明他在園亭建成之後，如何通過〈醒翁亭記〉、〈醒鄉記〉的意義詮釋與架構安排，和歐陽修以及屈原進行古今對談，終而在自我對佛教的信仰中破除醒與醉、迷與悟的二元對立。

當年，歐陽修貶謫滁州作〈醉翁亭記〉以表心志。在與民共樂的圖景中，一方面透露了他治理滁州的政績，展現其儒者情懷；另一方面也指出自我對山水之樂，得之於心而寓之乎酒的體會。然而從飲少輒醉、朝往暮歸的頻繁出遊以及蒼顏白髮頹然者，種種跡象亦透露了歐陽修心中的鬱悶。同樣的，龍膺遠赴湟中，作〈醒翁亭記〉亦正是有意藉由前輩典型以自況。只不過，他們二人所託雖一，在方法上卻有不同。其曰：「昔歐陽文忠強年解事，托稱『醉翁』於滁。予飲茲泉而醒，亦稱『翁』以自老。」¹²¹ 又曰：「文忠欲與滁人陶然游，而予欲與斯人惺然適也。」¹²²

其實，龍膺早年與歐陽修一般亦性喜飲酒，以至嘗有人言：「先生情癖，不死兒女子則死酒。」¹²³ 然而來到湟中之後，他卻決意以茶代酒。這之中的轉變可見於〈惕澗〉、〈釋惕〉與〈斷飲偈〉中的自我揭露：他戒酒的契機起因於母逝的悲痛，¹²⁴ 同時，也來自於長期飲酒造成的身體損傷。因此在歷經了反覆破戒的愧悔之後，他終於下定決心與湟中同志約定：將飲上池、餌苦茗，以醒自命。〈醒翁亭記〉以及〈醒鄉記〉二者的書寫背景即源自於此。此外，他特別在〈釋惕〉中將撰作時間以及地點標註為「辛亥夏書於北泉之醒翁亭」，¹²⁵ 亦正可見其戒酒、鑿泉、飲茶與命亭醒翁等等舉措之間的關聯性。

¹²¹ 明·龍膺：〈醒翁亭記〉，《綸灑文集》，卷7，頁161。

¹²² 同前註。

¹²³ 明·龍膺：〈綸灑先生傳〉，同前註，卷8，頁213。

¹²⁴ 見〈惕澗〉：「余不孝孤，慟母氏之棄杯棬也，遂禁酒體不御。」同前註，卷22，頁382。

¹²⁵ 明·龍膺：〈釋惕〉，同前註，卷22，頁384。

若將歐陽修〈醉翁亭記〉與龍膺〈醒翁亭記〉對讀，可以發現二人描寫的重點與敘事手法雖然有所差異，但也存在著不少對話的痕跡。歐陽修作為滁州太守，在山水之間得釀泉為酒，與客飲、與民樂，觥籌交錯、喧嘩而盡歡。而龍膺身為留滯湟中數月的兵備道，則在山水之間得蒙泉、烹苦茗，雖有一同觀稼的貳師陪侍左右，卻更像是一人獨醒的遊觀對話。歐陽修通篇以「醉」為引，貫穿「樂」的書寫。而龍膺則以「醒」為旨，不斷在遊觀的過程中叩問自身的處境。其過程如下：

亟舉白浮之，浮不二三徑醉矣。已，命童子注蒙泉，烹苦茗，一啜而醒。醒何以也？倚亭四眺，神與天游。群峰轟轟，巖岫亭毒，含虹吐雲，帶林蔭薄，可以醒吾目；飛泉萍萍，玄液石髓，鳴瀨砢砢，噴角嚼徵，可以醒吾耳；居者兪兪，行者嘻嘻，耘者耰者謳且奮，牧者扣角而歌于于，可以醒吾脾。¹²⁶

上文中所謂「亟舉白浮之，浮不二三徑醉矣」，對應的正是歐陽修「飲少輒醉」的書寫痕跡。然而曾經不一石不醉的龍膺，卻終而不願沈浸在醉酒的恍惚之中。醉，則以苦茶醒；醒，則瞰望前景。群峰、飛泉、居者、行者、耘者乃至於牧者一段的描述，也正可以對應至歐陽修在記文中的山間四時之景，以及傴僂提攜，相與安樂的情景。

繼湟中現實的情景之後，龍膺接續的二階遊觀，為超越時空的古今對話。遙想著曾經駐守邊地、抵禦外族侵擾的將士，如鄧訓擊迷唐、哥舒翰置神武軍、史寧破吐谷渾等人，俱是龍膺心中嚮往。其曰：「峽之數君子者，皆曠代之烈士，而社稷之勞臣也。論世尚友，予竊有志焉。」¹²⁷就出身軍籍，曾隨田樂將軍參與湟中三捷，爾後又任職兵備奉使邊地的他來說，前輩典範無疑是一種激勵的成功者象徵。至於獻地王莽的卑禾羌，或如大獵于拔山的隋煬帝者，則不足以成事。謂「興言及此，我心如醒。更酌茲泉，漱吾齒頰，且為千載之上，

¹²⁶ 明·龍膺：〈醒翁亭記〉，同前註，卷7，頁160。

¹²⁷ 同前註。

一洗垢顏。」¹²⁸

繼品評歷史人物的成敗優劣之後，龍膺的三階、四階遊觀，則在眺望中遙想神山仙關的存在，心與天遊。曰：「心神飛越，復不啻飲瀛洲玉膏矣。匪醉而醉，匪醒而醒。山光水聲縹緲，十二樓五城已收視返照，豁然有省。」¹²⁹ 可以發現，龍膺在的遊觀中有著不同的進程與思考。一開始，只是飲酒與喫茶之間的醉醒之別，進而是他對歷史人物的臧否，志高者則醒，沈淪者則醉。再而是他心神飛躍的過程中，介乎醒醉之間的神秘體驗。收束心神、回歸現實之後，歷亭而上，他在淡空庵裡如來法相莊嚴中，重新省思現世功業以及神仙輕舉的意義，並得到了關於醒醉、迷悟的最終解答：

光明法藏，遍燭三千，大地山河，納一芥子，賢愚奚別，喧寂奚分，何妍何嗤，何淨何穢，何欣之羨，何感之嗟。又庸詎知醉之非醒，而醒之非醉耶？其醉也，滌我甘露；其醒也，灑我迷雲。山為清淨身，溪為廣長舌。南方魔子，西方聖人，并趺坐一龕，遊戲三昧，疇醉而疇醒耶？毋論功業文章，直土苴糞壤；即神仙輕舉，猶然幻泡浮漚。正覺謂何醒乎否也。¹³⁰

由此可見，在佛教世界的思維中，龍膺不僅打破了醒與醉之間二元對立的區分；同時，也對追求功業文章以及企慕仙境的自身有了不同的體會。當然，以龍膺的性格來說，要他徹底的放下對自我成就的追求、對家國的關懷是不可能的事情，否則他日後也不會再重新踏上仕途，奔走於簿書軍旅之中。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上述書寫透露了他與自身誠懇的對話，也透露了他在挫折中如何安放自我的努力，並堅定地實踐自己寓託於淠地的政治理想——「願為此方善知識，以醒群迷，敢效左徒，聊歌〈孺子〉。」¹³¹ 也就是說，同樣作為楚人，同樣對於「清」有著固著的偏執，但龍膺走出了不同於屈原自投湘流的生命抉擇，

¹²⁸ 同前註，頁 160-161。

¹²⁹ 同前註，頁 161。

¹³⁰ 同前註。

¹³¹ 同前註。

他說：「予弗敢獨清，亦弗敢獨樂也。」¹³² 他願像漁父所歌，超越清濁對立。期許自己作為善知識者，以啟湟民蒙昧之知。一如他在〈淡空庵偈〉引楞嚴經典所言：「澄濁貯靜器，沙土自沉滅。」¹³³ 以及他在〈五月見楊花偶有悟入，時階藥屏蔽並開〉所詠：「悟來無揀擇，淨穢納應齊。」¹³⁴ 無論詩、偈都展現了龍膺將自我貶謫湟中的困悶及其高潔心志，轉化、調適為能夠落地實踐的教化理想。

在「醒翁」自明其志的亭記之外，龍膺對「醒鄉」的描繪亦可作為另外的書寫參照。一如梁頌成所言，〈醒鄉記〉雖然並未收錄在《蒙史》之中，卻可視作他編纂《蒙史》的心理基礎。¹³⁵ 他對醒鄉的想像與刻畫，正奠基於他在湟中的所作所為及其懷抱之心志。相對應者，筆者認為可以從三個面向來分析。

首先，醒鄉的所在地及其文化風俗，融合了龍膺對佛教信仰與湟中風土的詮釋。就地理位置而言，醒鄉「距佛國清涼界不遠」，¹³⁶ 風土習俗則與極樂國相近。透過「不遠」以及「近」的描述，龍膺一方面既未完全將醒鄉等同於佛國樂土，保留了他在闡釋與描繪時的彈性，然而另一方面也確保了醒鄉有著近似於佛國世界的品質。就空間環境而言，其地「多山谷巖壑，石礫礫，出名泉」，¹³⁷ 因此「舉國泊滋味，節嗜欲，惟飲上池，能延年卻老。」¹³⁸ 龍膺筆下所書與他在〈醒翁亭記〉中提到「湟治環萬山三峽而城」，亭中可見群峰轟轟，幾乎可見類同的風景，而醒鄉裡的名泉、上池，亦可對應至他所闢建的用來飲水喫茶的蒙惠泉。

¹³² 明·龍膺：〈湟北蒙惠泉記〉，同前註，頁 158。

¹³³ 明·龍膺：〈淡空庵偈〉，同前註，卷 17，頁 324。

¹³⁴ 明·龍膺：〈五月見楊花偶有悟入，時階藥屏蔽並開〉，《綸灑詩集》，卷 15，頁 672。

¹³⁵ 梁頌成：〈書成三黜題孤憤，詩就千篇逼大家——龍膺的生平與創作述論〉，頁 30。

¹³⁶ 明·龍膺：〈醒鄉記〉，《綸灑文集》，卷 7，頁 166。

¹³⁷ 同前註。

¹³⁸ 同前註，頁 167。

因此，當龍膺在文末提到「嗟乎！醒鄉氏之俗，豈極樂國之一區乎？何其國土清淨，與五濁世殊也？予近始游焉，因為之記。」¹³⁹可以合理的推斷他所謂「近始游」者，即是他在湟中生活的這一段時光。由此更可以進一步延伸指出，龍膺試圖通過〈醒鄉記〉的書寫，將湟中類比於不與世流合污的清淨佛國。

再者，龍膺細數從上古世界以降，居遊醒鄉之人，俱都高風亮節，且定與清泉流水有不解之緣。如神農臨流而嘗，許由、巢父瓢飲辟谷，孔子與顏子飯疏食而飲水，屈原行吟其間，以〈遠游〉明志，嚴光垂釣澤中等等，此外更列舉了許多於「品茶」有所鑽研的文人，甚至於高僧名衲，亦多老是鄉。此外，文中嘗引述文王卜筮得蒙卦與井卦，謂其以此通達醒鄉；而這兩個卦都被龍膺應用在〈湟北蒙惠泉記〉的書寫之中。前者用於蒙惠泉的命名，後者則被當地官吏用於頌揚自己的惠政。可以說，由具體的「上池」延伸而出，再由時間之遞進，列舉居遊醒鄉者由飲水而喫茶，其用意正在於將自己與眾多的前輩典型並置於同一個系譜中，以肯定自我於湟地建泉以改善湟民用水，並教之飲茶的行動。

再次，龍膺引述屈原賦〈遠游〉向漁父展現獨醒之志的行為，正可對應到〈醒翁亭記〉的書寫架構。筆者認為龍膺有意承繼屈原〈遠游〉之作，將遠遊的歷程包裝到他在醒翁亭的所見所思。龍膺的性格以及他對佛教思想的鑽研，使得他在記文中並未如屈原一般流露悲憤之情，也並未讓他轉而追求神仙世界；而是以一種旁觀而淡然的眼光遍閱所見之事，進而返視自心，省思醉醒之間的意義，以此重新肯定自我在現實世界中的努力與實踐。

總上所述，以〈醒翁亭記〉以及〈醒鄉記〉為中心的醒／醉之別與迷／悟之辯，可分從四個面向來理解。其一，從身體面而言，純是飲茶與飲酒的區別：品茗則醒，飲酒則醉，這一點同時也回應至他對於母親逝世後立下不御酒體的自我約定。其二，從政教面而言，是以歐陽修為對話對象，一方面通過類比以肯定自己在湟中的惠政，另一方面則透過差異，強調自己欲與湟民枕漱清流，

¹³⁹ 同前註。

以醒代醉的志向。其三，藉由屈原與漁父之間的對話與抉擇，一方面以「清」來肯定自己在仕宦中的貞潔，另一方面則欲以「淨穢兼納」的態度來面對現實世界。其四，從宗教面而言，是以佛教理想作為核心，化解醒醉與迷悟的二元對立。

四、結語

龍膺自萬曆八年（1580）通籍之後，隨即展開他四十餘年的仕宦之旅。家人的期待與自我實現的追求，使得他在這一條本就不甚平坦的旅途中，注定走得磕磕碰碰。家鄉的園林，遂成為他的精神庇護。龍膺在勝果園中與家人相處的人倫樂事，在瀝園、綸嶼之間往來上下的萍蹤浪跡，這些處處誌之，難以忘懷的記憶銘刻，不斷地成為他在師旅書簿中的召喚。而他一生對水石的喜愛及其與西寧的地緣，亦使得他在短短數月的時間裡，投入了蒙惠泉的開鑿，興建湟中園亭，既留下善政，也安頓了自我在羈旅中的鬱悶。

就園林發展而言，龍膺治園與傳統「吏隱」的概念有所不同。例如，唐代文人王維經營輞川，白居易履道園，皆以身雖羈束於仕宦，心則超然物外的態度，來經營他們亦仕亦隱的園林生活。然而，龍膺的三座私人園林皆是建設於罷官或者丁憂之時。而湟中開闢蒙惠泉、建設公共園亭，乃以教化為主；並且，當其居官之時仍編輯六記，心繫鄉園，可見他並非是以吏隱的心境來從事湟中建設。園林之於龍膺，不僅僅可作為仕途退轉的個人閒居空間，同時也是仕途當下的政治教化空間，其作為正具體展現了明代園林的多元樣貌，以及明人於仕於隱的普遍心境。

本論文主要以園林文學作為取徑，梳理龍膺在出處進退之際，如何通過園林的興建、命名以及書寫，安放自我。關於晚明園林文學的發展，曹淑娟先生嘗提出觀察，認為晚明的園林記文「有篇幅加長乃至分段聯章的現象」，例如王世貞〈弇山園記〉分作八章、鄒迪光〈愚公谷記〉分為十一章。¹⁴⁰筆者認為，

¹⁴⁰ 曹淑娟：《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頁31。

龍膺的〈溪園六記〉亦可視為此一發展脈絡中的作品，且具有別出心裁的特殊之處。

首先，在龍膺原先的設想中，〈溪園六記〉當不止於六篇作品。他在提及灑園中的安隱榭時嘗曰「別有記」，提到漣息草堂時亦曰「載別記」；雖然很可惜這些構想中的作品後續並未完成，然而這並不影響他在撰寫園林記時，確實有意發展成系列的書寫。這也與他將湟中撰寫的建物記視為系列，統一收錄在《蒙史》卷一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特別的地方在於，王世貞、鄒迪光等人的園林書寫，乃是環繞著同一座園林的興建，其中內容或有不同景區的規劃、遊園路線的導引，以及不同時間段增設的建築，而其意義皆統攝於園林的總名之下，或疊加、或豐富其層次。但是，龍膺卻是直接在不同的時間段裡，投入三座不同園林的興建，且在地點、命名以及主要賦予的意涵上皆有極大的差異。這使得「溪園三遷」的行動產生意義，串連起三座園林；也使得可灑可綸的「桃柳航」有其特殊性，容許他自由的轉換角色認同。因此，他筆下的三座園林既似獨立，卻又巧妙地串聯為一有機的整體。這是在其他的園林書寫中較為少見的現象。

就賦予的意涵而言，筆者認為，勝果園乘載了龍膺少壯時欲報家國而不斷出仕的浪遊經歷，以及退處時與家人相處的人倫之樂，展現的是傳統儒家「學而優則仕」及其重視人倫孝道的一面。灑園、綸嶼則各別寄托著他的釋、道理想。灑園，是他用以追薦雙親，與居士、禪者相互詰問、研讀法藏的佛教空間；綸嶼，則是他在漁仙打造的一處宛若仙境的洞天福地。至於遠在西寧湟中的園亭建設，則展現了儒家積極應世的一面；作為一座公共園亭，其標誌著龍膺在施政上的用心及其與吏民共樂的理想，此外，也具體呈現他如何透過山水之遇來排遣遭受詆毀、貶謫邊地的憤懣。這一點與勝果園之間可說是相輔相成，若將兩者並置齊觀，正可豐富龍膺以儒者之姿應世的生命樣態。勝果園，讓讀者可以一窺他橫跨較長時間段的仕隱經歷，其中包含多次的貶謫；湟中園亭，則讓讀者理解他在單一次貶謫的經歷中，如何通過園林的興造與書寫，來確立他的個人成就與自身價值。

對山水、對興造的執著，反映著他對園林存有之限的省思。園林既為人力開鑿，建成之後若缺乏維護，往往便在時間之流中走向衰頹，回歸自然本來面目。勘破興廢之理者，或曰：「何必居籬落下，然後為己物？」然而，對龍膺來說，他雖然理解園林主人當隨著時間更替、人事變動而不斷替換。但是，他認為山水亦會擇主。若園林主人未能妙解山水之趣，未能析名釋理，為其留下文字書寫，或者缺少買山財。缺乏上述任何一個條件，都無法作為山水的主人。他明白世間萬物都未能常為己有，但是唯獨山水例外，這是他一生對山水的執著。他認為自身所留下的書寫、命名，最終在己身消融之時，能夠與山水合之為一，而終為吾有。上述的心境，正是他大量撰寫園林記文，並且在其中強調自我與山水契應的核心關懷。

本文於梳理龍膺的園林書寫時，認為〈溪園六記〉與《蒙史》既分屬不同的作品，且兩者在園林屬性上亦有私人園林與公共園亭的區別，故而將討論分成兩個部分：以勝果園、灑園、綸嶼為一組，湟中園亭自為一組。不過，就園林建成的時間序而言，湟中園亭在灑園之後，綸嶼之前。這使得灑園與湟中園亭有著前後延續的關聯性，特別是書寫中有關佛教信仰的部分。前述已及，灑園是以佛教修持為主的一座園林，而他在湟中時的書寫亦大多混雜著自身信仰，例如將蒙惠泉視為八功德水，建淡空庵供如來法相，又在〈醉翁亭記〉中認為神仙輕舉乃幻泡浮漚，唯光明法藏，可解心中困惑。

此時，這兩座園林尚未展露他後來對道教仙境的親近。不過，筆者認為龍膺在萬曆三十八年（1610），他即將離開灑園赴京待選時，他對釋、道二分的想法便已經產生了變化。本文於第二小節第三部分解讀〈偃骨無學人傳〉時，已指出他「斥十仙為外道」的想法，因身有偃骨的緣故轉變為仙佛皆可，不必拘泥的心態。是以他從湟中歸返武陵之後，即將綸嶼打造為帶有道教神仙理想的一處洞天。但這並不代表他在綸嶼中完全摒除了佛教的元素，而是以洞天為主，將仙、佛涵納其中，達到了亦仙亦佛，二者兼融的自由境地。

就上述而言，筆者認為龍膺雖然有意識地賦予四座園林以不同的意義，但是其中仍然有許多相互貫穿的，如家庭記憶、仕宦經歷與宗教關懷等面向，無

法被截然劃分。這是本文在論述時，為了彰顯其各自意義，而相對未能深入解析的部分，因此置於結語，期能稍作補充。

（責任校對：王誠御）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宋·朱熹集注：《楚辭章句補注》，長沙：嶽麓書社，2013年。
- 魏·王弼等著：《老子四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 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年，第278冊。
- *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宋·蘇軾著，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明·溫體仁等纂修：《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
- * 明·龍膺撰，梁頌成、劉夢初點校：《龍膺集》，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
- * 明·龍膺：《蒙史》，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萬曆四十一年（1612）刊本。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2554207?tocOpened=1>。
- * 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 清·唐開韶、胡焯纂，劉靜、應國斌校點：《桃花源志略》，長沙：嶽麓書

社，2008年。

清·應先烈修，陳楷禮纂：《（嘉慶）常德府志》，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

二、近人論著

- 王乒乓：《明代永嘉文人音樂史料考析——「白鹿詩社現象」的發現、考證與探究》，上海：上海音樂學院音樂與舞蹈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戴微先生指導。
- 伍光輝：〈龍膺參與晚明結社活動考論〉，《中國文學研究》2013年第1期。
- 伍光輝：〈龍膺參與洪中結社活動考辨〉，《衡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4卷第2期（2013年4月）。
- 朱曉峰：〈明末戍將茶痴龍膺——青海西寧茶文化建設的奠基人〉，《農業考古》2021年第2期。
- 李世進：〈論龍膺與常德地方文化文學傳播〉，《文學研究》第16期（2021年4月）。
- 汪琴：《明代新安汪氏「二仲」的文學結社活動及文學創作》，安徽：安徽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耿傳友先生指導。
- 侯迺慧：《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 張興年：〈從「甘山初捷」到「松山大捷」——明萬曆二十三年「湟中三捷」管見〉，《青海民族研究》第23卷第3期（2012年7月）。
- * 曹淑娟：〈唐代官亭的建置及其書寫〉，《臺大中文學報》第67期（2019年12月）。DOI:10.6281/NTUCL.201912_(67).0002
- * 曹淑娟：《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年。DOI:10.978.9865452/117
- * 梁頌成：〈龍膺園藝思想對創建現代最佳人居環境的啟示〉，《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2期（2008年3月）。
- * 梁頌成：〈書成三黜題孤憤，詩就千篇逼大家——龍膺的生平與創作述論〉，《湘南學院學報》第29卷第4期（2008年8月）。

- * 梁頌成：〈龍膺與湖湘屈原文化〉，《求索》2012年第6期。
- 陳繼煦、李躍忠：〈龍膺詩學的性靈思想探析〉，《文教資料》第36期（2020年12月）。
- 陳繼煦：《龍膺詩歌研究》，湖南：湖南科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李躍忠先生指導。
- 楊在鈞：〈隱園居士龍膺〉，《禪刊》2003年第3期。
- 溫猛補：〈明代溫州白鹿社考〉，《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4卷第3期（2014年9月）。
- 趙宗福：〈明代「湟中三捷」考評〉，《青海社會科學》1987年第5期。
- * 劉 斌：《龍膺研究》，湖南：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呂斌先生指導。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Liang, S.-Ch. (2008). *Shu cheng san chu ti gu fen, shi jiu qian pian bi da jia: Long Ying de shengping yu chuangzuo shu lun* [The three degradations caused by his expostulation drove his pen to his anger, while his poems that amount to a thousand almost made him a master—A narration and discussion of Long Ying's life and creation]. *Journal of Xiangnan University*, 29(4), 26-35.
- Liang, S.-Ch. (2008). *Long Ying yuanyi sixiang dui chuangjian xiandai zui jia ren ju huanjing de qishi* [The inspiration of Long Ying's gardening thought for modern habitations].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3(2), 84-86.
- Liang, S.-Ch. (2012). *Long Ying yu hu xiang Qu Yuan wenhua* [The study on Long Ying's identify with Qu Yuan culture]. *Seeker*, 6, 151,158-159.
- Liu, B. (2013). *Long Ying yan jiu* [The study on Long Ying]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Hunan: Xiangtan University.

-
- Liu, Z.-Y. (2000). *Liu Zongyuan ji* [The collection of Liu Zongyuan's works].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 Long, Y. (1612). *Meng Shi* [The collection of Long Ying's works at Sining]. Japan: National Diet Library.
- Long, Y. (2011). *Long Ying ji*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Long Ying's works].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 Tang, K.-Sh and Hu, Zh.-Z. (2008). *Tao hua yuan zhi lue* [The chorography of Tao hua yuan].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 Tsao, Sh.-Ch. (2019). Tangdai guanting de jianzhi ji qi shuxie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official pavilion in the Tang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T.U.*, 67, 45-86.
- Tsao, Sh.-Ch. (2020). *Zai lao ji zhong anju wanming yuanlin wenxue yu wenhua* [Composure in laboriousnes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garden in late Ming China].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Yuan, Zh.-D. (2007). *Kexuezhai ji*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Yuan Zhongdao's works].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臺大中文學報

(第八十期抽印本)

三遷溪園，半生戎馬： 論龍膺的園林書寫

何 易 璇 著

臺灣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印行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三月出版